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从生命里过滤语言

米瑟斯，清高的自由主义老爷子

帕斯提奥的双重魔咒

情欲背后的伦理与权力

本土意识与台湾想象

拨乱反正从教育平权开始

“不与国家权力斗争的导演
没有拍电影的资格”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 庆 言 一
汪 伟 扬 克 孙骁骥 灵 子

轮值编辑

王晓渔

观察员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 成 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羽 良(北京)
刘 柠(北京)	严 飞(美国·旧金山)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 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 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 克(德国·图宾根)
灵 子(北京)	燕 舞(北京)
吴 强(北京)	言 一(成都)
朱 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米 格(广州)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

2012年12月 第6卷第10期

总第61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 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 观点尊重个人趣味, 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 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 对于相关部分, 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 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 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 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 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 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 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 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 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 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荷塘月色》的开篇，可以用来形容2013年初的心情。盼望着暖春，等来的是寒冬，一向温暖的南方也寒冷异常。南方是否需要供暖，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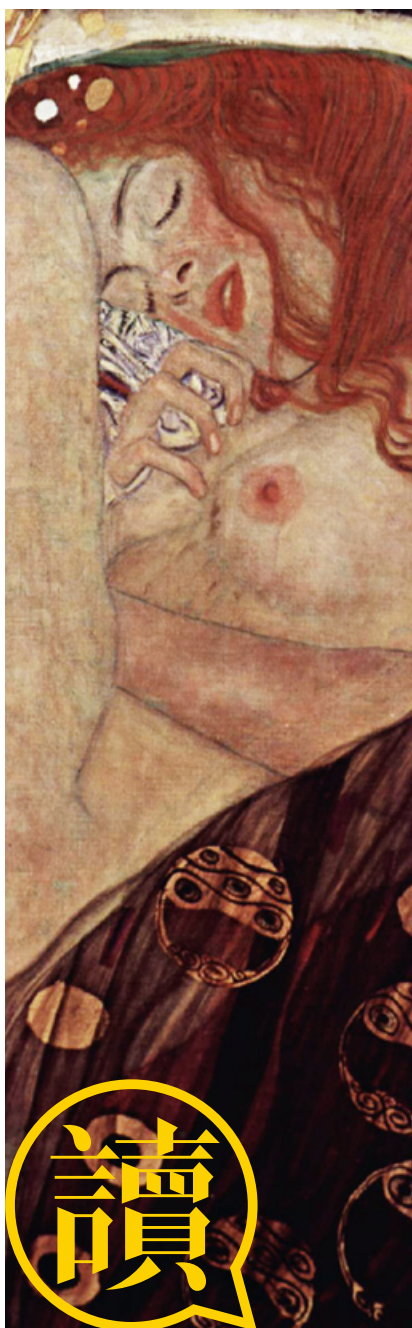
编辑“独立阅读”、阅读“独立阅读”，是一个取暖的过程。读着这些文章，仿佛隔着千山万水与朋友们卧谈。每一位都有着自己的趣味和观点，又共享着一些价值观。阅读朋友们的文章，内心的充盈并不亚于阅读那些典籍。两者无法相提并论，但是朋友之间的交流，有点像摩擦生火。在冰天雪地里，“独立阅读”温暖如春。

有时，我们阅读的经典太多，朋友之间互相阅读得太少。



目录

封面用图
lady with fan
Gustav Klimt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005-025

经济 • 苏小和
文学 • 戴新伟
思想 • 孙传钊
宗教 • 成庆
文史 • 王晓渔

阅读报告
台港海外

026-030

美国 • 罗四鸰
日本 • 刘柠

书评

• 凌越
从生命里过滤语言

• 朱芳艺
米瑟斯, 清高的自由主义老爷子

• 罗四鸰
帕斯提奥的双重魔咒

• 米格
情欲背后的伦理与权力

031-057

游历

058-060

• 成庆
本土意识与台湾想象

随笔

061-063

• 吴强
拨乱反正从教育平权开始

影像

064-066

• 刘柠
“不与国家权力斗争的导演
没有拍电影的资格”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suxiaohe@gmail.com)

宏观经济的层面，当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货币的超发掩盖了市场的真实反映，导致经济的一些重点市场存在巨大的泡沫，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大型国有企业和一些有一定政府关系的地方企业、私人企业，前几年纷纷介入房地产市场，导致地价和房价的快速增长，而这种增长的逻辑很大程度上来自货币要素，而不仅仅是真正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步，中国的加工制造业肯定受到了来自货币要素的逼迫，流动性不足严重影响了一线的生产和出口，因此维持多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抑制。但是国内并不自由的消费性市场，却没有爆发出内需型增长的态势，这使得整个宏观经济出现了最近10年无明显增长热点的状态。也就是说，整个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处在一个疲惫和观望的等待时期。

从经济史的层面解释这样的市场现象，当然要指向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这次金融危机背后的一次更大范围内的商业周期现象。正是由于全球性的货币因素，各国政府超发的货币，拖后了市场的自动出清，一个本来可以理性出清的市场周期，被政府的力量严重拖后，导致全球经济的本次周期性波动时间过长，经济的衰退在政府货币刺激的政策之中，只是出现了非常短暂的局部性复苏，然后又迅

速沉到了衰退周期之中。

这就是此时此刻中国经济面临的大背景。恰好中国遇到了新一轮领导人换届，新的政策走向并不明显，不过有一些已经出台的政策因素，能够帮助我们粗略地分析大势。或许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货币超发的灾难性后果，新的领导人并没有沿袭前任领导人的货币政策思路，比如李克强反复强调的是城镇化。在经济学的理论维度上，这显然是威廉配第的城市化理论的运用，即借助城市化激活工业化，借助城市化解决整个市场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寻找到城市化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增。比如习近平反复强调的改革要素，也意味着政府层面已经意识到了必须要建立一套新的，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游戏规则，否则整个经济的运行会出现巨大的不均衡。

由此，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再一次摆到了中国人的桌子上。

比如关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政府干预模型，就值得真正关心中国经济的人们再次思考，他著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需要强调的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模型，是建立在完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学术模型，更是建立在美国这样具有自由竞争经济一般性特征的经验之

上的模型。即凯恩斯首先假定了关于经济或者非经济因素波动的市场信息，是一种完全透明意义上的自由信息，各种市场竞争的要素在这个完全透明信息的市场语境里，具有同样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在这样的意义上，凯恩斯通过一种数学的分析，得出了市场的波动主要来自于需求方面的影响，即在一个商业周期的中后期，市场的价格在短期内的变化显得极为缓慢，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跌倒最低谷。正是这种低谷的来自需求方面的波动性价格，破坏了市场的一般均衡。面对这种局面，凯恩斯的解决方法，显然是要在一个完全竞争经济的语境下避免或者减轻经济周期给整个市场带来的损失。他信心十足地认为，政府，而且是一个自由制度的政府，应该在这个时候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使用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整个市场的总需求进行刺激或者控制，从而抵消宏观经济需求层面的种种干扰。

如果真正理解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模型的学术参照系，理解了他对自由竞争经济的一般均衡秩序的肯定，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论，即凯恩斯的学术模型完全不适合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与实践。因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凯恩斯所强调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市场语境，也没有美国市场经济的自由经验。失去了这样极为重要的学术前提，简单粗暴地借用凯恩斯的学术模型，只能将竞争不足

的中国经济带入深渊。

事实上，即使是绝对尊重一般均衡理论的凯恩斯，在纯粹经济学学术的演进方面，也存在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货币史研究，就是从批评凯恩斯的政府货币刺激与财政刺激开始的，他与施瓦茨合著《美国货币史》（巴曙松、王劲松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弗里德曼的分析框架是，凯恩斯对信息完全充分的假定，是错误的，市场的信息不可能出现完全充分的状态，而且，当市场信息出现之后，市场的波动会出现一种叫做“时间滞后”的效应，正是这种滞后的市场信息的时间效应，给市场的自动出清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并存在着一种市场的自身能够缓慢趋于平衡的经济态势。如果这个时候政



府急躁的介入市场，用凯恩斯倡导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市场，反而会让市场的供需关系变得更加震荡。因此，弗里德曼坚定地得出结论，应该有一种关于市场的中期考量，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只对货币的供应进行控制，并始终保持不变的货币增长率。

如果用弗里德曼的理论模型来分析中国最近几年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走向，会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感觉。主要是这几年的货币政策几乎完全不尊重市场波动的“时间滞后”效应，完全没有给与市场自动出清的任何时间和机会，急促地推出一系列货币刺激政策。更加有趣的是，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几乎是对弗里德曼学术模型的反向而动，不仅不是弗里德曼所倡导的控制货币，保持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反而是大规模超发，让中国的M2也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整个中国的市场都生存在一个巨大的货币泡沫里。

不过，弗里德曼并没有在这个领域穷尽真理，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他提出的“时间滞后”效应问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了弗里德曼的理论，这就是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卢卡斯（R.lucas）和他的学术伙伴萨金特（T.sargent）的学术贡献，卢卡斯著有《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朱善利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他们认为，弗里德曼提出的“时间滞

后效应”的确是存在的，不过却只是市场波动过程中的一个“瞬间的现象”，而弗里德曼显然放大了这个时间概念，遮蔽了市场波动过程的其他重要的要素。因此，两人的研究认为，要加入微观经济的重要元素来进行分析，比如在货币导向的宏观经济秩序里，加入企业、家庭或者个体消费者。这样，市场的波动局面是，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单位或者是微观要素所需要的经济信息，一直是不充分的，而每个微观经济的要素，尤其是每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理所当然地通过一种“理性的预期”来决定自己的市场行为方式。站在这样的真实市场的基础上，卢卡斯和萨金特的理论认为，凯恩斯理论没有将公众对政府政策以及其他各种经济信息的主观偏好纳入到他的数学分析模型中，因此使得任何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存在不确定性，即政府不可能通过具体的数学计算手段，来量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这使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具有巨大的破坏性。由此，卢卡斯和萨金特尽力主张，政府应该尽量不要干预经济，即使在不得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市场的时候，必须要守住政府政策的连续性，不可仓促上阵，抛弃前期稳健的财政政策，盲目对市场进行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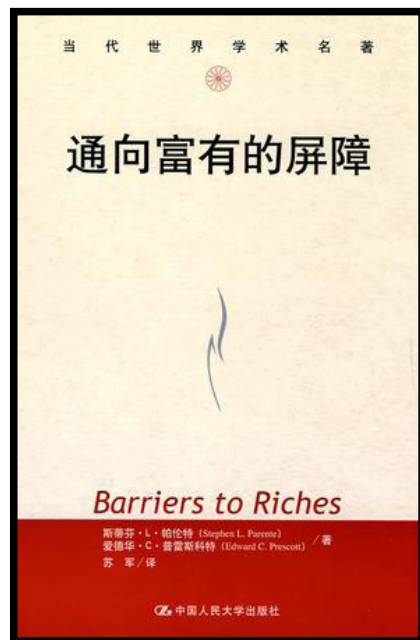
卢卡斯和萨金特的学术价值在于，他们在宏观经济研究的学术框架中，考量了微观经济的要素，尤其是考量了公众理性预期和个人主观偏好的要素。这可以说是

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飞跃,即任何经济市场的研究,都是一种对人的行为的研究,而人的行为的核心意义在于人的主观主义。反观中国经济最近几年的政策波动,他们完全停留在静态的供需均衡意义的层面,就基本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在工作,不仅凯恩斯关于“信息的充分”和弗里德曼的“信息的不充分”没有进入中国经济决策者的视野,弗里德曼重要的“时间滞后效应”也没有被借鉴与使用,至于卢卡斯和萨金特对人的行为的主观主义倾向的尊重,则完全没有考虑,整个国家经济的政策都只是在总量上进行谋划,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和国家计划的经济特征。

关于货币要素与商业周期的隐秘关系,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说凯恩斯、弗里德曼、卢卡斯和萨金特都是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商业周期,提出解决方法,事实上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家基德兰德(F.E.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C.prescott)沿着供给的角度建构了分析模型。目前,两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并无系统翻译到中国,倒是普雷斯科特与人合著的一本《通向富有的屏障》(苏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在国内有正式出版。

作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学者,他们提出了真实周期理论的模型,认为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不是需求造成的,而是供给造成的。显然,这是对萨伊经济学

理论的延伸,随着供给的波动,价格和工资在短期之内发生快速变化。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显然把问题的重点带到了生产领域,经济周期或者市场的波动,是经济对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变动的一系列有效的反应。比如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技术波动,能够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和投资,以及产出相应地提升,导致整个宏观经济的总供给曲线上移,因而经济的总量上涨。反之,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技术波动,必然引起劳动生产率的衰减,就业和投资的减少,因而总供给曲线下行,经济总量减少。因此,市场表现出来的商业周期,并不是整个供需关系对市场均衡体系的偏离,而是一般均衡体系本身的小范围波动。也就是说,表面看上去具有很大震荡效应的



商业周期现象，事实上一直在市场的均衡范围之内波动，这意味着市场的波动一直具有帕累托效率，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是人们对市场波动的一种局部性和短期性总结，而政府之所以主动干预市场，仅仅是盯住了这种短期的局部性波动，属于更加短视的行为。由此，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坚定地说出了一个事实，面对商业周期波动，政府的任何意义层面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赤字政策，都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在商业周期面前，任何性质的政府，都是愚蠢的。

应该说，沿着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学术模型，分析中国最近一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可能最切合实际。常态下，政客都是短视的，而大政府体制下，尤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转型而来，尚未完全实现真正市场经济制度的大政府，其经济决策可能更加短视。有人曾经嘲笑中国的某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几乎是以几个月的时间长度来决策的，而在商业周期的理论看来，尤其是从商业周期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一般时间长度，应该是在5年到10年之间。这的确是对任何政客的一种巨大的试探，即使是美国的政府官员如奥巴马，他也会试图在自己的任期之内，彻底走出商业周期经济波动的阴影，实现经济的普遍复苏，因而他的政府推出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可能都是围绕政府的货币超发政策。至于中国政府高

层经济官员的视野，应该要比奥巴马这种民选的官僚短视很多，也肆无忌惮很多。所以，有专家说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语境下，如果美国走出金融危机的陷阱，实现经济复苏需要5年的话，那么中国这样的专制大政府计划经济国家，至少需要10年才能走出低谷。

当我们进行这样的学术分析，恐怕会得出几个令人失望的结论。第一，至少在经济学理论的层面，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至今尚未走上市场自由演进的轨道。或者说这样，人类关于古典经济学或者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发现，在中国宏观经济的秩序里，尚未发挥其一般性的作用，如同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经济政策依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第二，此时此刻的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周期的中后部，中国经济远远没有摆脱自2008年开始的经济波动，很多真正市场化的问题被政府的大规模的货币政策掩盖，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新的领导人要想在宏观经济的层面迅速形成增长的格局，惟一的办法，只能是继续超发货币，让猛烈的M2像吗啡一样，刺激中国经济加速朝前走。第三，必要的思考是，是不是所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适合中国的经济特色，是不是需要建构仅仅适合中国经济特色的新经济学理论，以解释今天中国经济的现状？应该说，的确有学者在这么做，比如大名鼎鼎的林毅夫先生和他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但这真是解决中

国经济问题的捷径吗？

一个有着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的经济学家，应该理直气壮地指出，中国经济并无可能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中国的经济环境从来都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例，需要改革的，肯定不是已经被实证主义论证过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原则，而是刚刚上路的中国经济秩序。或者我们干脆指出，需要改革的肯定不是真理，而是中国不能以特色之名曲解真理，抵制真理。❶



观察员 戴新伟（广州，pessoa1935@gmail.com）

《始有集》（刘铮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有一篇《书评家奥登》，介绍这位大诗人的书评文章特色，乃是浅显易懂，不避俗事，比如评论费雪女士的饮食文章。这里有一句我印象颇深，奥登提到了“我在中国的时候”，刘铮说“这似乎是整本书中唯一一次提到中国的地方”。

这句话用在新近翻译出版的《战地行纪》（马鸣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1月）一书似乎也合适。在这本由奥登和衣修伍德合写的中国游记里，衣修伍德负责散文的部分，详细记叙了两人在中国的行程，而奥登的诗歌，即使有那句著名的诗句“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抛弃”，诗歌文本却并没有（似乎也不能）呈现他的直观感受，特别是读者能看到的，尤其是和衣修伍德的文章相比——详细的行程，形形色色的人物，丰富的细节，准确而强烈的感受，形象机智的比喻，等等。诗歌是另一个层面的分析。《书评家奥登》的最后一句云，“或者因为我自己是个不大能鉴赏诗歌的书评人，所以，奥登对我而言，是大诗人，更是了不起的书评家。”套用一句，则《战地行纪》的诗歌部分不论如何解读，散文部分绝对是一流的文章。

1938年1月，奥登和衣修伍德是从香港进入广州再深入内地，应出版社之请，观



察中日战争爆发后的中国。关于香港到广州的这段旅程，曾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从澳门到广州的传教士留下的见闻，还有旅行家珍·莫里斯在其《香港：大英帝国殖民时代的终结》（黄芳田译，台北：马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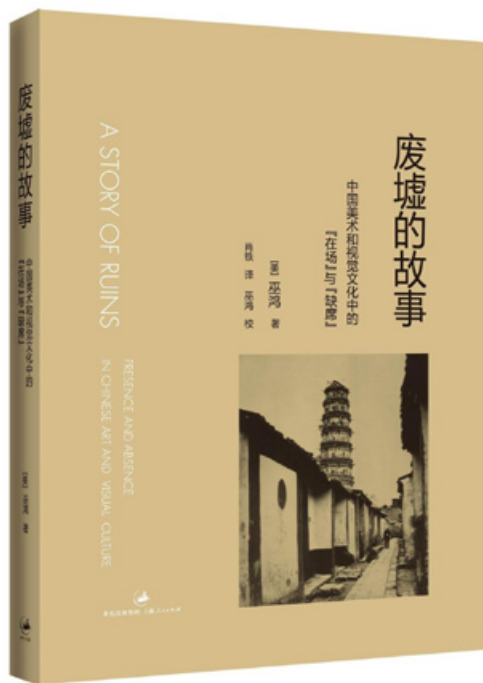
亨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7月)

一书开篇所写的, 一度我深为其庞杂丰富的材料所叹服。但与衣修伍德的经历一比, 似乎就能明白冗长与直接之不同: 即将进入虎门炮台, 他们所乘坐的“台山”号贴着一艘日本炮艇驶过, “当水兵们在甲板上走动, 或者擦拭着火炮瞄准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脸……”这一段推荐阅读, 因为它不仅是衣修伍德对日本兵近身的观察, 也同样给今天的读者一个近距离了解侵略者的历史瞬间。

以其对广州的观感而论, 衣修伍德能够将形势、地区特点、人物等信息, 非常清晰的反馈给读者。他记录了接受他们采访的广州市长曾养甫不少口误的英文发言 (后面还有不少政府官员的), 但并不给人刻薄轻佻之感, 反而比较幽默, 正如他评价曾养甫的, “这种轻蔑不屑而又温良敦厚的逗趣, 我们一致同意, 确乎是一个富有教养且爱好和平的国家在其宣传中去打击一个残忍自负之敌的应有调子。”衣修伍德对不少人物的描写和比喻, 不仅准确、形象, 而且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幽默感。举两个例子, 蒋介石接受采访拍照时, 给他的感觉是被罚站的小学生, 而我们所熟知的史沫特莱同志, 在他眼里是这样的: “没有可能不去喜欢她或尊重她, 她如此地严厉、乖戾、富有激情; 对每个人都如此无情地挑剔苛责, 包括她自己——当她缩成一团坐在炉火前, 似乎一切的苦难、全世界一切的不公

义, 都如风湿病正令她痛入骨髓。”

与中国有关的, 近来还见到两种。一是引起很大争议、也以引起巨大争议而在大陆宣传其吴镇研究的徐小虎, 她的《**被遗忘的真迹**》(刘智远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2年10月**) 虽然看了颇有所得, 但存疑处亦复不少。这种越是有争议的学术著作, 越要听听专家的说法, 如果仅仅听一些赞扬的评论, 实对怀疑无所解答。不过巫鸿的《**废墟的故事**》(肖铁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 却读得欣喜。这是巫鸿对传统中国美术中的“废墟”观念及其视觉表现形式流变的考察, 由古及今, 从古代绘画到战争废墟、《小城之春》的废宅, 到当代艺术的一些表达。以前读英国艺术史家克里斯多佛·武德尔德所著的《**人在废**



墟：文学、艺术与历史中的废墟美学》（张让译，台北：边城出版，2006年1月），即被这一观念研究所吸引，但是局限在了西方的艺术氛围，而巫鸿无疑是借住这一观念，回到中国的艺术场域，把一些常见的概念推得更深刻，比如从废墟上来研究中国的怀古诗，并细分怀古诗与废墟诗。在此书第二章探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摄影时，有一段分析值得留意：

“另一方面，受难之所以成为视觉再现的主题，是因为它为抵抗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支持。所以，战时中国的废墟图像虽表现了挫伤，但也起到了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辩护的作用。这些图像因此最精确地涵括了与中国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痛苦和欣喜，拼搏和牺牲。”

这段话足以用于我们看待《战地行纪》的照片，用来分析奥登与衣修伍德的游记，亦无不可。🔴



观察员 孙传钊 （上海, sunchuanzhao@Yahoo.com.cn）

本雅明曾说，一个人真正读过的书大致是他藏书的10%，鄙人生活困顿，没有什么藏书，但是一年中真称得上“读过”的书，大约也就占去年曾在自己住所“逗留”过一周以上的书的总数的10%。这里对这10%中读了有所感悟的书写点备忘录。

1. 《完美的证明》（玛莎·葛森著，胡秀国、程姚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该书围绕俄罗斯数学天才格里高列·佩雷尔曼证明庞加莱猜想又拒绝一切奖励的事迹，讲述了前苏联数学天才特殊教育的格里高列·佩雷尔曼历史。几年前曾读过该书的日文版，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又读一遍。感触如下：旧苏联教育体制中歧视犹太人子女，禁止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和我国讲父辈阶级政治成分，剥夺一些“可以教育好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有历史的雷同。值得讽刺的苏俄十月革命时期的高级干部，犹太人占了绝大多数，连列宁也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格鲁吉亚人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之后，反犹太才逐渐增强。另一方面，苏俄教育体制尽管和我国有类同之处，但是毕竟有西欧传来的传统，不仅可以从百余年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信仰及其著书中可见，斯大林时期苏俄的大学还有这样的痕迹，所以才会出佩雷尔曼这样的人物和培养他成才的各个阶段的“红烛”。该书的第



十章，值得仔细阅读，中间讲述了我国几位数学家在角逐庞加莱猜想证明的荣誉之中的表现。蛮滑稽的，与佩雷尔曼成南北极地的对照。读该书时，正巧有一天一个来修房

子的泥瓦匠问我：“奥数”是什么，他儿子的老师老是“奥数”、“奥数”，我回答他：做很难的数学题的国际比赛，获奖的高中生可以赚大钱、娶美女。对于失去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中国青少年来说，奥数，毒品也。

2. 《梅尔维尔的政治哲学——“切雷诺”及其解读》（李小均编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该书收入梅尔维尔的小说《切雷诺》以及三篇美国学者从不同视角的解读论文。我很少抽时间读小说，梅尔维尔的小说例外，还曾为他的《比利·巴德》的中译本（《漂亮水手》）写过书评。对《切雷诺》固然有很多角度可以切入解读，但是，我读后和读了《漂亮水手》一样，只有一个直感：梅氏老是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不能伸张正义的历史环境和暴力社会中，当个人遇到冤屈乃至生命危险时，何种选择才是正途？以暴制暴之外还有选择吗？为此，我总要想起那位罕见的、令我仰慕的京都刀客。

3. 几本埃里克·威廉斯的著作：《内心的渴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特立尼达多巴哥人民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加勒比地区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帝国主义与知识分子》（《帝国主义と知識人》，岩波书店，1984年）。威廉斯著作、特别他的处女作《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论证了与以往史学界不同的观点：西方

废奴主义者最初提出废除奴隶制度，不是出于他们的人道主义，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废奴主义提出背后最大的推手。个人、集团、群体、国家的经济利益成为某种学派、改革、政策的幕后推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历史研究、政治研究时，我们应该不时朝这个视点检点一番，不要被骗子忽悠了。对于西方列强来说，威廉斯无疑是左派，他反对孤立古巴，但是认为古巴是极权主义体制；他强调民族文化，又坚持源自欧洲的普世的价值观念。

4. 托尼·朱特《重新评价：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Reappraisals: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 Penguin Press HC, 2008）。这是朱特在1994年至2006年12年间撰写的23篇书评、随笔汇成的文集《重新评价：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与他最后完成的《沉疴遍地》等三本小册子相比，更能反映朱特的信仰及其背景。

朱特从小在英国长大，属于被英国文化同化的“犹太人”。他的民族自我认同是：自己属于英国的“少数民族”，在英国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本身就生活在历史的边缘”。所以20世纪不少犹太人知识分子都曾在共产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道路上留下足迹。他说：“我是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成长起来的，虽然在今天这一点也不值得自豪，可也确好处。我的父母及其

父辈们都信仰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全盛时期的发展方向所显示的一些信条，所以我出自一个拥护社会民主主义的、属于犹太人社会民主主义协会那一派的东欧犹太人社会中的家庭，是彻底的反共产主义者。因为家族所见所闻尽是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独裁政权有关的事情，而其种种犯罪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种丑恶的模仿。另一方面，我在大学入学之前，19世纪古典读物已经打下根基。结果当才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启示的同一世代的大学新生同学们（指狂躁的1968年世代）显示出过度狂热的时，我没有那种感觉。”

因此朱特从中学时代就关心作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环——源自俄罗斯平等主义乌托邦理想的“乡村共同体”——左翼复国主义运作的“谁也不剥削人、不受人剥削”的基布茨。15岁的朱特投身于以色列的乡村基布茨共同体中，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里单纯的生产劳动不能满足自己好学的求知欲。特别使他反感的，1976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一爆发，基布茨里的“勤劳”、“朴实”的村民，马上就暴露出迷信暴力、好战的本相。这些让他政治上早熟特殊的左倾经历，决定了他以后鄙视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而且尽管他自己也属于1968的那一代，却对1960年代登场的欧洲战后新一代的左派抱有警惕和反感，一直追求第二国际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

《重新评价》的前一半的书评（很多是对传记的评论）或随笔的主题是评价阿瑟·库斯勒、阿伦特等10个知识分子。其中保罗二世教皇也可算是知识分子吧！朱特说他“是精通胡塞尔哲学的知性教皇。”[其实，《重新评价》中提起的知识分子远不止这10位，还有左拉、茨威格、哈威维、卡尔·格拉乌斯、马格利特·布巴（努曼）、奥威尔、君特·格拉斯、萨特等等。]

我们从朱特的知识分子论所选择对象可以发现，他最关心的是那些曾信仰马克思主义、甚至参加过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人物。《重新评价》第一、第二部分评论的10个人物，除了布里莫·列维、爱德华·赛义德、保罗二世教皇之外，大多拥有这样的经历。（赛义德虽不是共产主义者，可是一般都被人们公认为左翼，保罗二世出身波兰，其社会背景、身世与共产主义运动兴衰有关）这种关注倾向和朱特政治自我归属是一致的。在朱特看来，那些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世纪航海者”犹太人知识分子正因为失去故乡、家园，导致它们具有特别的长处：成了世界主义者，不会沾染狭隘的爱国主义、不太会陷入民族主义的狂热。

5. 《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太人背后的欧洲史》（拉尔夫·乔治·劳埃特著，陈艳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十月革命中活跃的犹太人》（《ロシア革命で活躍したユダヤ人たち》，中泽孝之著，

角川学艺出版社, 2011年)。《大逆转》通过历史回顾, 说明希特勒青年时期并不反犹, 还有一些犹太朋友。1919年德国出现无产阶级革命后, 出于潦倒、困窘, 开始怨恨犹太人, 认为他们发动的革命造成的动乱使自己失去了在军队栖身之地, 犹太金融寡头控制的德国经济则是自己经济贫困的根源, 甚至“凡尔赛和约”也是国际金融寡头犹太人幕后操纵的产物——相关事件都正巧发生在1919年。反犹主义理论因为不是他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以至于以后还发生未曾料到的、让他感到十分恼火的事情。政敌含沙射影地说他自己就有犹太人血统, ——泽拉尔《希特勒一族》和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都有介绍。

日本中泽孝之的《活跃于俄国革命的犹太人: 探索颠覆帝政的主角的背景》分析了很多俄国犹太人为何投身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缘由。中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归结以下几点: 一, 一些革命者们把革命作为俄国历史上的对犹太人的残酷镇压对抗和报复的手段。二, 犹太教教义给与他们一种历史使命感。犹太教教义中自以为上帝的选民, 生来就有高尚品质, 对慈善献身无私的牺牲精神对他们人生观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三, 犹太人家庭教育促成了他们形成追求革命的动机。为了理解神的教诲之需要, 即使贫困的犹太人家庭也把接受教育作为一种义务, 母亲是实施这种教育的核心人物, 正因为家庭重视教育缘故, 形成良性循



环, 而与其他民族相比, 犹太人识字率相当高, 而且有一种强烈探究心、好奇心。犹太教教义根本上的怀疑主义和“救世主”信仰, 更是促使他们探究自己遭受歧视、迫害的原因。四, 与西欧相比, 俄国反犹传统历史悠久长达2000年, 那里传统是欧洲反犹中心。五, 欧洲反犹, 犹太人失去故乡、家园, 导致它们具有特别的长处: 成了世界主义者, 不会成为狭隘民族主义者。而这种世界主义, 却成了希特勒反犹藉口。

总之, 德、俄两国的反犹——在富裕犹太人居多的德国, 一个成为边缘化的落魄者制造了“纳粹主义”的理论借口; 在东欧, 相反是边缘化的落魄者群体自身组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人力资源。边缘化的人们呀, 有着可怕的能量。

6. 2012年编译过一本小册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大学》，其中所收，有一篇是密尔“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典礼上的演说”。翻译中感触最深的是密尔在演说中说到历史、地理教育那段话：

“我还经常感慨：为那些从学校毕业之后，很少再接触书籍的工人阶级子弟在小学开设历史、地理课程另当别论，但是在中学还继续设置这些课程就非常愚蠢。你们曾见到过不是自发读书，真正学习历史、地理的人吗？因为在所有的知识中最富有魅力的、也是最容易理解的历史和地理，是可以通过自学习得的知识，所以我不得不说，不培养学生必要的读书习惯及以读书为快乐的趣味的那些教育制度，在中学设置这样的课程完全是失败的。大学是引导学生走向‘历史哲学’的场所，即大学不仅是让学生知道各式各样事实的场所，还成了用理性的光芒照亮这些事实的教授们向学生开示人类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和尽力说明其各种要因的场所。历史批判、验证历史的真实，也成了这个教育阶段应该诱导学生去关注的课题。若是一个对被普遍承认的历史事实能发挥某种知性能力的青年，踏入了历史学某一部门的房间，就能学到所有必要的知识了。这样的青年之所以会把这种知识和其它大部分普遍知识作为自己必需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少年时期被教了这些东西，倒是他们能够活用丰富的藏书的结果。”

我曾在一所三流大学代课，那里的学生（几乎90%农家子女）连教科书也不买，我企图激发他们对历史、地理天然好奇心，增强了授课内容历史趣味性，可惜，他们对此毫无兴趣，对我的授课嗤之以鼻。关心的是否能习得一夜暴富的手段和诀窍，热衷于争当学生干部、牟取锦绣政治前程的竞争。

7. 《诗的见证》（米沃什著，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书中，米沃什又提到波兰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z，在《米沃什词典》中也提到），让我想起他的《被禁锢的头脑》一书开首就是极力推崇维特凯维奇的1930年的小说《贪得无厌》。2003年这部小说被改变成电影。

小说的故事是通过一个18岁的高中烦恼男孩齐普乔的眼睛去看待西方文明的瓦解过程。英俊的男孩继承了波兰的一个大酿酒厂，自己却是个空想主义者。他在两位求爱者的亲近过程中变得腐败堕落，分别是颓废的公主爱琳娜，她追求的是他的钱；另一个是疯狂的同性恋僧侣，看中的则是他的处子之身。随着这展开的故事充满了色情的性描写，而这种狂热的性描写正是为了突出动物性肉欲泛滥是社会腐化的特征。

小说描绘现实波兰知识界宗教界、政界、军界全部腐化，精神文化、形而上的、

高雅东西全部被色情、性欲、金钱、物质取代，为何这样？当时波兰边境——波罗的海附近已经被支那、蒙古军队占领，乌烟瘴气已经蔓延到波兰内地，最后波兰被支那、蒙古军队攻占。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未来世界——遭受中国攻击的东欧，充满了黑色幽默、性爱嬉戏以及讽刺的社会经济学教条，援引不少现代哲学的词句，被称为是“未来主义派”的作品。

米沃什称维特凯维奇预言准确。但是今天中国人虽然能看到小说改变的电影《贪得无厌》，从网上的反响来看，大多都不懂这电影真实价值，把它作为黄片看待，网上有个白痴还恨作者把世界精神生活堕落归咎中国人，说当年苏德两国应该永远灭了波兰。这种心态与希特勒、斯大林倒是是一致的。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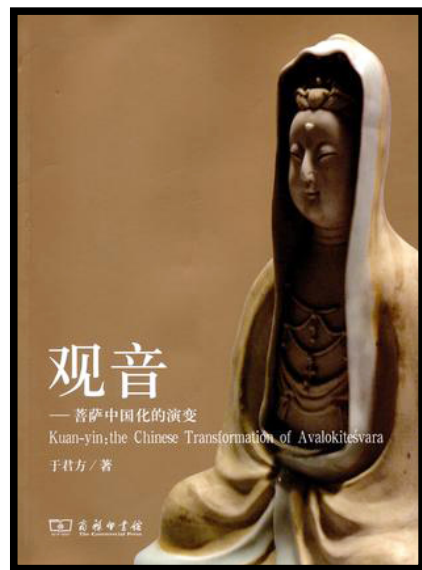


观察员 成庆（上海, veron.cq@gmail.com）

今日中国思想之纷杂程度，或许从公共思想界就可以窥得一二。从1990年代末兴起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到今日“国家主义”、“儒家宪政主义”、“社会民主派”等各家的自说自话，都折射出经过十余年的社会变化，今日中国的思想状况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或许是知识精英不再垄断社会思想议题，而开始是随网络公共议题而动，这无疑彻底地扭转了过往以“知识圈”主导公共思想议题的趋势。尽管对于许多1980年代成名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甚至还秉持着强烈的“精英士大夫”作风，但公共思想议题的社会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另外则是各种新兴“思潮”开始与社会结合，而且不再集中于对政治议题方面，而更多与宗教、心灵、传统文化相关。这种关注个人精神层面的趣味与取向尽管常常会被诟病为“去政治”，但就社会重建层面来看，这却又是未来中国社会自我组织化的必经过程。假如没有宗教、文化等资源的充实，社会势必将会维持“原子化”的形态，而无法生长出具有与体制相区别的文化主体性。

从这期开始，笔者会陆续介绍一些近年公开出版的佛教读物，借此去描述当代中国的宗教信仰现状及其存在形态。毕



竟，信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私人领域的问题，而是借由大规模的信仰实践深入社会内部，开始形成了有资源、有行动力的信仰实践潮流。任何人都难罔顾这样的社会现实，而面对这样的潮流，就算是对“信仰”持有偏见者，也理应开始学习如何理解宗教，尤其在是我们自身的宗教信仰传统被活生生地截断了多年之后，要恢复起中国人自己的心灵生活，或许还得从头开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的系的于君方教授，在抗战时期曾随家人四处逃难，她的外婆是位虔诚的佛教徒，日日持诵《大悲咒》，并礼拜观世音菩萨像。抗战胜利后，他们全家准备返回家乡，在武汉

等待数月才获得船票，就在全家准备上船时，其外祖母突然不让大家上船，说是观音菩萨现其身相，并以右手示意其不要上船。于君方的母亲是大学生，并是一位历史教师，自然不信此类神灵感应，但外祖母的坚持与威严最终阻止了全家上船，就在驶离码头不久，这艘船就撞上日军埋设的水雷，不幸沉没。

正是这样一个常人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观音感应”故事，让于女士从此对观音信仰持有浓厚的兴趣，但当她来到哥大读书时，她发现西方世界所理解的观世音菩萨与中国完全不一样，这让她愈加困惑，也终于促使她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写下这本《**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陈怀宇、姚崇新、林佩莹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8月**）。

和一般学者不同的是，尽管于教授是以纯学术的方法来写作此书，但其却同时也是佛教徒，并且从1976年就开始学禅，并于近代台湾最有名的禅宗大德圣严法师座下皈依，至今在法师曾驻锡的法鼓山道场，还经常流传着于教授外祖母的“观音感应”故事。而今天，“信仰”终于借助学术的形式得以表达。

对于一般人而言，假如不满足于民间信仰化的礼佛、烧香，想要通过阅读去了解佛教教理，会发现这类读物也是名目繁多，流派各异。其中坊间较流行者也分三系，分别为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及汉传佛教。虽

说万法归一，但于这三系佛教，因其所植根之文化土壤各异，因此其文字、教法也各有差别，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因于20世纪大规模弘传于欧美，于西方文化多有交融，故在弘教方面，更合现代人的趣味。如泰国著名禅师阿姜查的《无常》、《关于这颗心》、《证悟》以及《这个世界的真相》等等，于藏传佛教方面，则有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正见》、《人间是剧场》等等，而对于汉传佛教而言，则一般会以圣严法师的《学佛三书》以及印顺导师的《佛法概论》作为认识佛教理论的入门读物。

就这三脉佛教系统而言，南传佛教僧团虽重《阿毗达摩》的教理学修，但于一般大众而言，则常常是重禅行而轻教理，于现代都市人群而言，更有其简捷明了的特点，甚至其“教法”还会被玄思好辨之人视为“心灵鸡汤”。但佛法的教理浩瀚如海，除开南传佛教的三藏经典，藏传大藏经以及汉传大藏经更是汗牛充栋，姑且不论业余学佛者，就连专修之学问僧，单闭关阅藏一遍，就要花上数年。要想从教理入佛教，显然对大部分人而言，并不现实。

只是佛教的学修与一般知识的学习的确有所不同，虽然佛教也重教理的学习，但是同时却也极重实践性的修行，强调从“行”去体解“理”，汉传佛教中一脉中的禅宗，就以“简洁明了”、“单刀直入”的修行方式而著称，于重教理的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形成鲜明对比。

但显然，这类读物的引入只不过是
一片信仰的空白废墟地，撒上了第一颗种
子，还有很多人视佛教为一般的民间信
仰，而罔顾佛教当年曾以玄思深辨的特色
征服了魏晋名士，与玄学清谈交相论辩，如
在徐清祥的《**门阀信仰——东晋士族与佛
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
一书中，就详细罗列了魏晋之际，门阀名
士出家成风，蔚为一代风尚，而今沦落为与
“求神拜佛”同流，也算是这数十年反传统
文化落下的后遗症吧！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卡诺凡写过一本阿伦特政治思想研究，是阿伦特研究中被频繁引用的著作，但是这本书一直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她的《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陈高华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进入中国之后，也没有引起关注。卡诺凡研究了阿伦特在国会图书馆里的手稿，对此前自己著作中的观点有很多纠正。她指出，阿伦特的关切与极权主义经验有着很大关系，虽然阿伦特对希腊城邦有着高度评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要回到过去，她的观点更多地建立在对极权主义反思的基础上。阿伦特批评一种宿命论的观点，这种宿命论认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但又认为对方是无所不能的。在这种宿命论下，个人的作用被彻底取消。这种观点不仅表演在认同极权体制的个体上，也表现在一些反对者身上，比如他们会把未来和希望交给趋势和潮流，不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现状。

作者还指出阿伦特的一个批评：“人们无法通过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更高的事情，避开对于当前所做之事的责任，如浪漫主义诗人和非世界的哲学家的所为”。这种批评让人想起德国学者勒佩尼斯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高新华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书中讲到德国有重文化、轻政治的传统，认为文化是



永恒的而政治是短暂的，文化是高贵的而政治是肮脏的。因为这种观念，政治的变化不再是被关注的对象，或者说政治成为少数人的领域。甚至会出现这种景象，浪漫主义诗人、非世界的哲学家和独裁者成为朋友，如果有人批评前两者，立即会遭到反批评，称你是用政治干涉文学或者说用政治干涉哲学。在这种情况下，极权政治没有阻挡的蔓延开来。

严祖佑先生的回忆录《人曲》（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8月），讲述了一个不允许人存在、只允许神和鬼允许的情况下，坚持个人的尊严如何困难。只允许神和鬼存在的时代，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

缺乏城邦生活的时代。在城邦里，公民拥有公共讨论的空间。严祖佑是严独鹤先生的儿子，在1964年因为与朋友形成一个讨论文学与社会的群体，以“反革命集团”的名义被捕。重病中的陆小曼因为给他们这个群体中几位作者的诗集写过序，受到惊吓，很快去世。

虽然历史的残酷和荒诞罄竹难书，但是作者的文字非常平静，愈是平静愈是衬托出那个年代的疯狂。作者不仅描写了那些扭曲的他人，也坦承自己的人性同样被扭曲，同时承认人性的弱点。从看守所到农场，伙食改善许多，每一个刚从看守所来的人都觉得是天堂。作者这样说：“这也许就是人性。但凡把一个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再提升到第十七层，恐怕都会感恩的。对他来说，这第十七层地狱仿佛就是天堂”。

文革时期的监狱（包括看守所）值得研究，郑念先生的《生死在上海》（**百家出版社，1988年**）、杨小凯先生的《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英若诚的《水流云在》（**中信出版社，2009年**）和刘文忠先生的《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澳门：崇适文化，2008年**）均有精细入微的回忆，严祖佑、郑念和刘文忠都曾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除了郑念是被单独关押，其余诸位都在回忆中详细讲述了他们与狱友的交往，其中不乏具有深度的思想讨论。



1919年6月，陈独秀先生说过一句传播至今的话：“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到了文革，研究室没了，监狱却是空前的发达。对于思想犯来说，监狱也成了唯一的“安全”的讨论思想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已经没有了被捕的顾虑。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遇到很多同道，有思想的基本上都集中在这里。

或许是因为近百年儒家承担了太多自己无力承担的责任，被压抑得太深，这几年儒家的复出带有强烈的“复仇”气息，使得原本温和的儒家具有了攻击性。一些当代儒生把儒家视为完满的传统，在其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善的价值。一种儒家原教旨主

义呼之欲出，对儒家的批评被视为对儒家的无知。

狄百瑞先生对儒家传统的态度更为复杂，他认为儒家传统是多样的，不是单一的。如果继承儒家传统，首先要继承儒家的自省传统。在《**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尹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里，狄百瑞对那种亚洲价值以儒家传统为主而儒家传统适合威权统治的说法提出批评。他指出，儒家有着社群主义传统，但也会被威权主义政治借用。这种自省的传统，在当代儒生的著作中很难看到。

如果要为儒家减压，首要要为儒家减负，不必希望儒家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资源。

王焱先生述而不作，但每有只言片语，必有所见。这本《**社会思想的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收入了他为数不多的文章，虽然选题看似分散，从陈寅恪到托克维尔，似乎没有踪迹可寻，但内在的理念却是一致的，关切到如何保守文化的传统，同时推动政治的维新。王焱特别强调，要把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区别开来。文化保守不等于政治保守，这种保守不以对其他文化的排他为前提。政治维新不是坐等明君开恩，宣布“咸与维新”，也不是把

君主推翻，取而代之。

书中很多问题点到为止，比如作者把民初称为中国的魏玛时代，可惜只是在一篇书评中提及，未能展开，这个题目可以写出一部重新叙述北洋时代的著作。有些地方我略有不同意见，作者认为李零先生是以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我更加倾向于认为李零是以法家兵家纵横家反儒。从这个角度而言，张木生先生是李零的知己，在那本《**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里将李零隐而未显的立场凸现出来。不过，李零也开始亮剑，2011年11月在九三学社中央的演讲稿《环球同此凉热——我的中国观和美国观》即已图穷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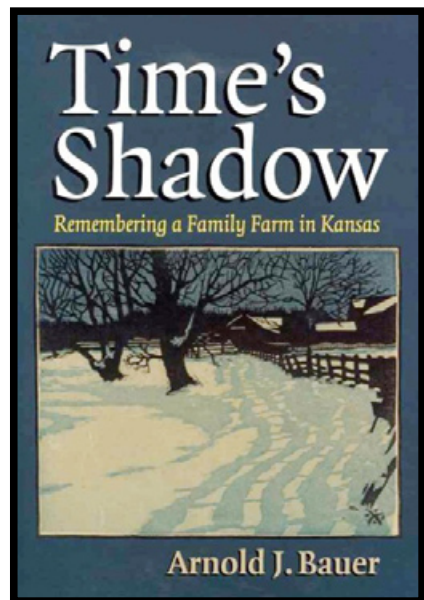
越近的历史，往往越是模糊。搭配阅读日本学者川岛真先生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和台湾学者唐启华先生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有助于摆脱对中国近代史的悲情叙事。鄢烈山先生主编的《**白纸黑字**》（敦煌文艺出版社）已经出版三辑，书中很多文章记述了正在经历的或者刚刚过去的时代，弥补了“在当下的写作中缺少当下”的遗憾。Q

特约观察员 罗四翎 (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从前,有两个德国兄弟,开始收集他们那个年代最好的童话故事。他们收集了一批关于王子和公主、森林、城堡和巫术故事,还有关于食人族、肢解、谋杀和恶毒的后母的黑暗传说。1812年12月20日,他们收集的86个童话《儿童与家庭故事》出版,成为世界经典,这便是第一版格林兄弟童话的第一部分。

为纪念这本世界上最广泛阅读的经典之一出版200周年,近日,德国启动了近乎一年的纪念活动。而对于一些文化观察者来说,这却是一次再次审查这一文化遗产的机会,而这个文化遗产常常与德国历史的阴暗面联系在一起。一个理论认为格林兄弟的故事对德国民族性格的塑造有负面的影响,这个看法在二战之后变得更加普遍。路易·斯奈德在他1978年的《德国民族主义根源》一书中提到,格林兄弟促使了一些有害性格的形成,像是纪律、服从、独裁,对暴力的颂扬和民族主义,这些特性成为了德国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二战之后反法西斯同盟的指挥官们禁止在学校教授这本书,他们称,在格林童话的世界里他们找到了纳粹主义的根源。

“德国人为什么会犯下贝尔森和奥茨维兹集中营这样的恶行?”,对此,德国作家金特·比肯费尔德认为,在这些童话故事



可以找到答案。不过,在我看来与“格林童话”内容本身相比,更需要重新思考是格林兄弟对待童话的方式:有必要如此同一吗?在阿多诺看来,正是这种追求“同一”的理性导致了集中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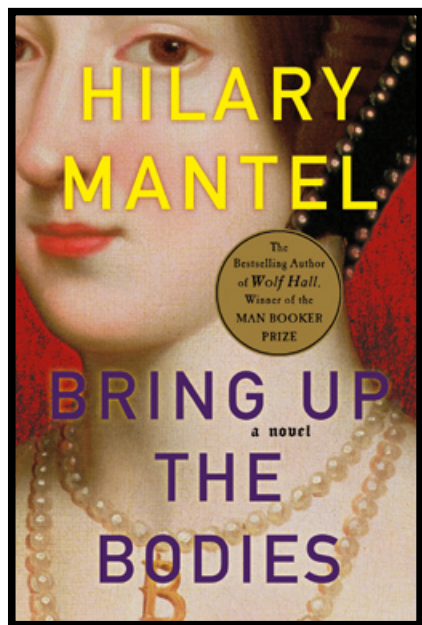
“自由是最高善。因为,没有自由,就不可能存在人格。”偶然翻到这句话,于是,寒假的时候选了罗素为伴。1948年,已是76岁的罗素在BBC电台做了一系列演讲。

“在这一系列讲演中,罗素把自己多年来对人类本性和人类社会矛盾的研究成果,用简洁的语言提纲挈领地公布于众。”这便是《权威与个人》。

在这本薄薄的书中，罗素指出，“这个世界已经成为教条式政治信条的牺牲品，在我们时代的政治信念中，最强有力的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不相信用一种教条的和不具有缓和的形式，它们中的任何一方能对各种不可避免的邪恶提供一种医治。资本主义给少数人以创造性的机会；共产主义能够（尽管它事实上没有做到）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十足依附性的安全。”

实际上，早年的罗素曾高度评价过共产主义，但是，当他访问苏联后，发现那里不能容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尤其让他气愤的是，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于是这位“人道主义与自由思想的代言人”说道，一个社会的重建，不仅在于消灭财产上的邪恶，更在于消除权力的邪恶。据说，年轻时候的罗素认为，他曾执教的中国是他理想中的生活的代表，“没有再比中国更具开放心灵、面向实际的文明了。”据说，罗素后来也纠正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可惜，我没有找见。只是忍不住设想了下，若是看到这个冬天的中国，罗素会说什么呢？

与这位英国贵族相比，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对自由的阐释似乎更得我心。在他看来，自由的基础在人性之中，而民主不仅仅是这种基于人性的个人生活方式，更是对能作出理智判断和行为的会人的能力的信任。因此，民主的最后保证即在于街头巷尾人们自发地阅读未经新闻审查的报刊，自由商讨国是。



波士顿的冬天有些漫长且单调。岁末的圣诞假期不是图书出版的好时机，却是图书销售的好季节，各种图书推荐榜纷纷出台，《纽约时报》竟然推出100本年度好书，不仅望而生畏，而且生疑。最后，我选择了《大西洋》月刊文学编辑 Benjamin Schwarz 的书单：一句话推荐一本书，五句话推荐了五本书。

1. 《伟大的海》(The Great Sea, David Abulafia, OXFORD)。作者信实、严谨且富有神韵地叙述了地中海从公元前22,000年到公元后 2010年的一大段历史。

2. 《时间的阴影》(Time's Shadow, Arnold J. Bauer, KANSAS)。作者描述了1930年代到1950年代堪萨斯州的乡村生

活，以出色的想象、思考和悲悯叙述了那个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

3. 《品行良好》(Good Behaviour, Molly Keane, VIRAGO MODERN CLASSICS)。在这本有些阴暗和尖酸的小说里，作者用神奇的技巧塑造了一个复杂的无力的却令人不安的形象。

4. 《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 Hilary Mantel, HENRY HOLT)。以抒情的笔调与严谨的机智，作者出色地展现16世纪的英国社会，描绘了一个精彩的人物。

Benjamin Schwarz对这本书的推荐非常泛泛而谈。曼特尔是2009年、

2012年两届布克奖得主，这本精彩的历史小说也是其上次获奖作品《狼厅》续集，是其计划创作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2012年布克奖评委会主席彼得·斯托萨德(Peter Stothard)评价曼特尔是“当今最优秀的英语作家之一”。在这部小说中，曼特尔“用全新的方式书写了现代英格兰的起源”。

5. 《莫斯科，1937》(Moscow, 1937, Karl Schlögel, POLITY出版社)。作者用出色的文学才华和严谨的历史架构，在令人眩晕的全景中，再现了“大恐怖”控制下的共产党人的“新耶路撒冷”。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我从内务省的窗口往里张望，但见众多官人（即国家公务员）把书摊在办公桌上在埋头读着，在检阅，在挑错——就是说，他们在工作。我想，这大约就是所谓的集团阅读吧。事实上，在为他们感到遗憾的同时，竟然也有些羡慕他们。之所以羡慕，是因为自己忙得几乎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呢。”

这是日本已故出版家、著名学术出版社 Misuzu 书房的创始人小尾俊人，在其作品《书之诞生以及诞生之后》中所描绘的1940年的一幕。作者作为羽田书店的新职员前往内务省警保局“纳本”（按战前日本《出版法》和《新闻纸法》，所有出版社均有把出版的所有种类的出版物送交内务省检阅的义务，称为“纳本”），目击了审查制度运转的场面。

研究日本社会，不能不关心二战前的新闻审查制度。上世纪30年代，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和日本国际环境的日益险恶，言论空间越收越紧，内阁、军部均有专设部门专事言论管制。卢沟桥事变后，内阁情报部沿习陆海军省报道部的先例，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

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



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没商量。

直辖内务省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组织，跟踪、“喝茶”自不在话下，对被认为言行“出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新闻记者，不惜动用绑架、酷刑，甚至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

而所有这一切迫害，都是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以维护“国益”和“稳定”的崇高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

实现的。在这种意识形态部门、国家恐怖机关和军部，组织机构叠床架屋，彼此间利益协调、情报共享、相辅相成的立体化作战攻势下，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至战时，日本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密如裹尸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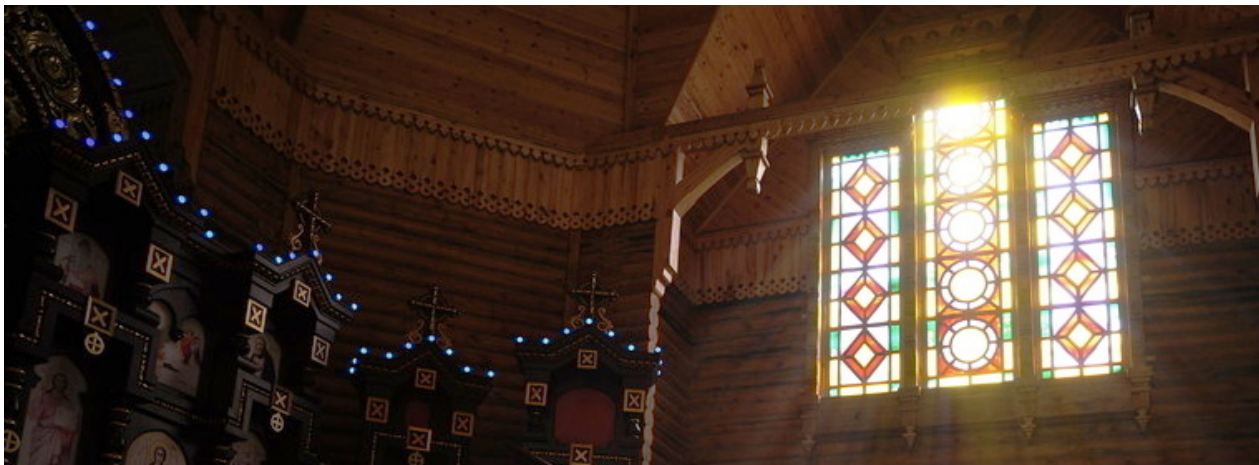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异端”思想的空间被彻底封死，有时连“自己人”都难幸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认为日本顶尖的战略家、“九一八”事变的幕后推手石原莞尔，因其不主张中日战争扩大化的“消极”立场开罪了东条英机，其战略学著作《战争史大观》、《国防论》虽然已经分别由中央公论社和立命馆大学出版会付梓成书，但却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由宪兵队监督

强行绝版。

小尾俊人2007年出版了一部厚达650页的、砖头一样的回忆录《出版与社会》，见证了日本出版从走向大众媒介化之初的繁荣到言路被窒息的全过程，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此著连同其与新闻出版有关的其他几种已面世著作，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昭和出版的“良心史”。本文开头提到的个性化历史记述，几乎成了弥足珍贵的孤证。

那段略带讥讽口吻的奇妙描写，令人联想到卡夫卡小说中的情节。幸也罢，不幸也罢，日本现代出版业在大众媒介化量产时代的开端，竟然就这样与新闻检阅制度的全盛期微妙地重合在一起。❶

从生命里过滤语言



特约撰稿人 凌越（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小说家哪怕在写评论时也像在写一个故事，而批评家在叙述事件时也往往充满着思辨色彩——斯坦纳的回忆录让我们再次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说，在萨义德的回忆录《格格不入》中，思辨还只是和事件同等重要的伴生物的话（其笔触可以用思辨式的叙事形容），那么在斯坦纳的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中，思辨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个人事件已经被逼入墙角杳无，只是在各个角落里，像密码一般勉强拼凑出斯坦纳的个人履历和生活细节。

《审视后的生命》不是一本很厚的书，译成中文只有十四万字多一点，但是内容却非常丰富，其涉及议题之广阔以及论述之深入绝非同样篇幅的书籍可以比拟，一般传记和回忆录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人事件描述在这本书里少之又少，抱有八卦心态的读者未免要大失所望，但如果你对真知灼见抱有热情，那这本书绝对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佳作，用洞

见迭出来形容它也不为过。

既然是回忆录，我们还是从书中吝啬地透露出的斯坦纳的生平细节谈起。斯坦纳的父亲是奥地利中央银行资深的法务人员，本身钻研法律和经济理论，但是对音乐、文学、艺术有强烈的兴趣和感受力，“父亲的书架上摆满了日耳曼形而上学和文化批评著作，从康德到叔本华和尼采，德文诗与戏剧经典作品，如兰克、蒙森、格雷戈洛维乌斯等重要历史学家的著作”。斯坦纳的母亲则熟稔多种语言，常常在讲话时，以某种语言开头，以另一种语言结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我的童年生活便是一场隆重学习的庆典”。

在这本回忆录中，斯坦纳只是将少许生活事件放入，因此这些事件要么隐含有深意，对于斯坦纳随后迫不及待展开的思辨起到某种隐喻般的提示作用——一种生活和思想的古老联系，要么就是特别突出和有趣，它们犹如生活这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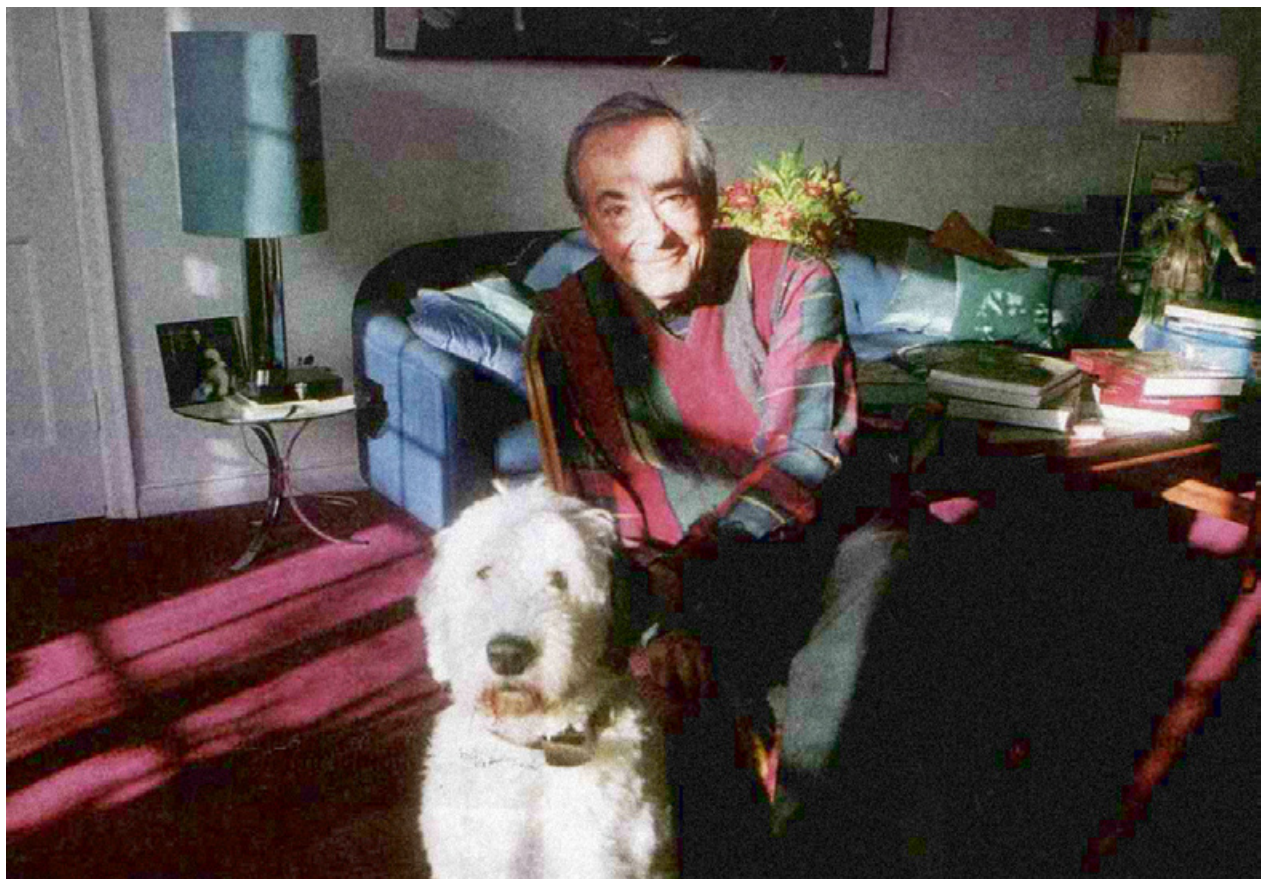
平静的湖水里偶尔涌起的浪花，任凭斯坦纳有意压制（出于自尊和对自恋的警惕？），仍然不顾一切地冲出重重思辨的迷雾，带给读者忍俊不禁的微笑。

在第四章斯坦纳以难得的轻松笔调写道：斯坦纳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的室友亚尔菲原先担任伞兵，他对斯坦纳当时的处男之身颇为不屑，便主动陪着斯坦纳到伊利诺伊州的西塞罗，为他“安排了一场既彻底又温柔的启蒙”，事后还让“宽慰安心”的斯坦纳请他搓了一顿龙虾凯撒沙拉大餐。在芝大，年少的斯坦纳已经因为出众的学业而知名，以至于考试前一群学生来到他的寝室，“他们挤在床的上下铺和地板上”，请斯坦纳帮忙解释乔伊斯的短篇小说《死者》，于是他发

现自己“在漫漫长夜开始授起课来”，而他的听众只是他的同学而已，讲到动情处，“我克制着自己不流下荒谬的眼泪”，

“从那晚起，教学和诠释的塞壬女妖为我歌唱。”

在回忆老师和同道的第九章，斯坦纳还讲述了有关新批评泰斗艾伦·泰特的一件轶事。1948年新创立的博林根诗歌奖颁给了庞德的《诗章》，评委包括艾略特和艾伦·泰特，当时庞德因为叛国罪（在二战中支持墨索里尼）尚在狱中，因此抗议之声不绝于耳。评委被指支持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最激烈的反对者是诗人卡尔·夏皮洛，他认为泰特是个死硬派南方佬，恶名昭彰的反民主主义者。有一天晚上，斯坦纳正在宿舍睡觉，昏昏



斯坦纳

欲睡的守夜人来通知他，说泰特教授将看重斯坦纳的立即造访。斯坦纳还以为自己刚交上去的研究报告出了纰漏，非常紧张地赶到泰特家。当然邀请和作业无关，泰特刚刚写了一封挑战书给纽约的夏皮洛先生，要求和他决斗，而请斯坦纳来，只是想咨询他在犹太人的信仰和道德背景下，身为犹太人的夏皮洛是否可以接受决斗的挑战？当然结果有点让人扫兴，夏皮洛觉得这件事太过荒唐，便发表了他和夏皮洛的书信，这段插曲也就无疾而终。

然而，书中像这样轻松有趣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斯坦纳不会允许这样的事件喧宾夺主，使回忆录沾染哪怕丝毫的轻浮气质，事实上整本书总体气质是庄重肃穆的，有着大理石般的光泽和分量。书的副标题“审视后的生命”是一个准确概括，通常斯坦纳在叙述一件事情之后，即转入对事情的抽象思辨，或者走得更远，这事件只是起一个引子的作用，而他浓墨重彩的都是他一直深感兴趣的一些抽象命题：对大屠杀的反思，对于理论思潮泛滥的警醒，对于语言、音乐的精微思考。

书的第一章即为这种写法定下了基调。开篇斯坦纳以细致的笔调描绘出他们一家人在奥地利乡村度假的气氛，“这大而空旷的度假农舍越来越冷，现在想起来，那时大概发了霉”，还是孩童的斯坦纳感到不耐烦，恰在此时，他的姨丈从萨尔茨堡带回来一本“有蓝色腊质封面的小书”，一本纹章学入门，小斯坦纳立刻为这本书所着迷：“这本书令我目眩神



乔治·斯坦纳 [美]
《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
李根芳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34元

迷，让我了解到世界具体物质和形式有无数明确、精致、多重特殊性。”作为大学者的斯坦纳一生不知道阅读过多少书籍，他自己就写过三十多本专著，但在他的回忆录的第一章详细讲到早年看过的这本不起眼的小书，那一定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正是这本小书，让斯坦纳对独特性与差异性越来越着迷，“差异和分类是如此之多，任何分类和计量都是不可穷尽的”。随后当斯坦纳转入对于“理论”的批判也就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了，“无论是情感、知识及专业各方面，我都不信任理论”，因为“理论不过是失去了耐心的直觉”。作为一个在理论的黄金年代孤独的人文主义者，斯坦纳学术生涯所受

到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对于理论的批判的确深具说服力，因为斯坦纳自己的文风就是一种极端敏感难以被归类和总结的风格，斯坦纳用这样的文风批判流行的理论风潮实在是恰如其分，而他本身充满魅力的行文也顺便成为他的观点的绝佳例证。

以此为出发点，斯坦纳之后提出的各种观念及其对这些观念的辨析都是令人期待的，那至少是带有个人选择、品位和回音印记的观念，它在语言和节奏的罅隙里穿行，敏捷又自如，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读诗一样，在还没弄懂语言的确切含义时，就已经被他语言的魅力所倾倒。他是西方学者中少有的充分尊重非理性直觉的学者，“理性那种往往未经检验的自大，切断了可确认的经验与可能真正重要基本之事的联系”，而作为对这种呆板理性的反拨，斯坦纳往往将自己的观点推进到理性和感性遥远的接壤地带，那里人迹罕至却是意义疯狂繁殖的肥沃土壤。斯坦纳的文风极具创造力，有着鲜明的个人化的印记（所谓风格），而这正是创造力的表征，一般西方学者所擅长的逻辑性，斯坦纳自然不在话下，同时在这种绵密的文论文风中，斯坦纳还善于给出一针见血的格言式结论，这些格言掷地有声，不容置辩，它似乎就是它自己的明证，比如：“纯粹的真理能够容忍匿名。”“理论是失去了耐心的直觉。”“世界的极限实际上是语言的极限。”“文法就是希望。”等等。在此，我以为斯坦纳已经掌握了诗人的拿手好戏——命名。

他给出结论，而这些论断又是那么准确和迷人，似乎不再需要二流学者笨拙地论证。同时，斯坦纳思维的跳跃也很像诗人的思维方式，他习惯于在各种事件和观念中腾挪游移，而它们之间似乎的确存在着被我们一直忽视的隐蔽联系，并且为彼此的存在提供证据和支持。我以为，此点正是斯坦纳的文章虽然晦涩但却迷人的重要原因，我们因此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饱尝了美的盛宴，或者说，斯坦纳所提供的知识本身就充满柔韧的美感。事实上，书中的许多段落就是一流的散文诗，那是被斯坦纳抨击的“理论家”们想破脑袋也写不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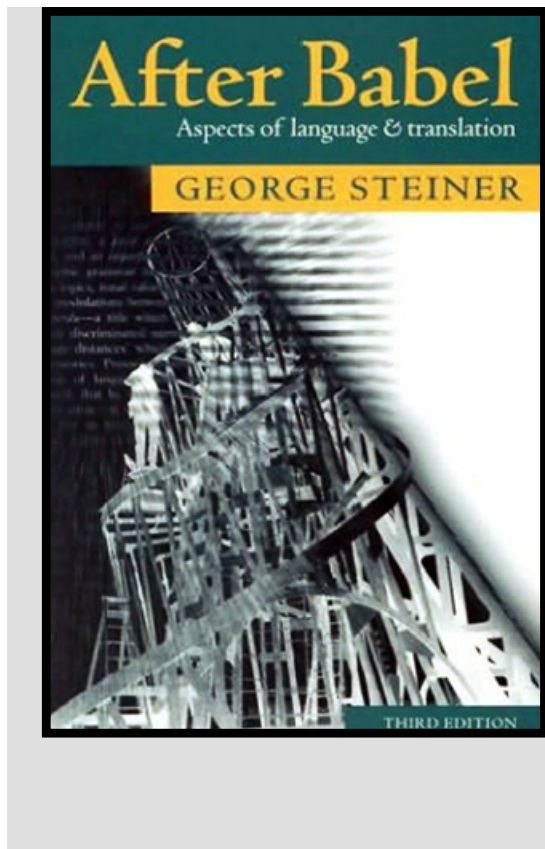
更为重要的是，斯坦纳绝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修辞家。他用他敏感的文字探讨的正是这个世界和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些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论多么模糊暧昧，都要去探讨文字与世界的关系；无论多么难解，都要去探讨文本、艺术作品的意图，寻求认同。”首先就是对于大屠杀的反思，斯坦纳是犹太人，他对此问题的探讨因而尤其具有一种沉痛的力量。正面论述此问题是在第五章，但是前面四章似乎一直在为第五章的出场酝酿着苍凉的氛围。作为一个1926年出生在欧洲的犹太人，只要他开始回首往事，他就逃不脱死亡的气息。斯坦纳的父亲是一个敏锐的犹太人，他很早（1933年）就预见到犹太人在纳粹治下的悲惨命运，他一遍又一遍徒劳地向亲友发出警告。正是在此背景下，在小斯坦纳快要过6岁生日的某个深冬之夜，父

亲向他朗诵了《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杀死吕卡昂之前，他们之间的对话。斯坦纳在书中全文引用了这些对话，因为父亲提议他把这些话背下来，“所以阿喀琉斯这段话的平静无情，温柔的恐怖，永远铭刻于心。”也就是说，对于死亡意识，对于死亡的命运，小斯坦纳在6岁的时候就经由父亲的提醒开始思考了。

第三第四章，斯坦纳描述了他在美国学生时代的生活（当然是一贯地以思辨的笔触为主，论题在对莎士比亚和拉辛的精彩对比中一再转移和迷失），因为父亲的警觉，他们一家在二战之前已经移民到美国纽约。对于犹太人美国无疑是安全的，但是“南风往往使空气中洋溢着屠宰场的血腥味和恶臭”，欧洲犹太人被虐待被屠杀的消息正源源不断传到美国。

到第五章，因为前面章节的铺陈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冷酷气质，斯坦纳终于可以讲笔触转向他念念不忘但又不敢轻易触碰（因为带有太多惨痛的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大屠杀议题——也即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何会一再发生（纳粹的暴行不过是最近的一起而已），原因究竟为何？因为“没有任何有力的分析，能提出宗教、政治、经济或社会理由，虽然这些因素多少都有些关联”。斯坦纳的结论是：“唯有神学和形而上学才能说明事实的悲剧复杂性。”

按照斯坦纳的说法，犹太教曾三度让西方文明面对理想的“敲诈勒索”：由犹太教经典发展而来的严厉的毫不妥协的道德规范；犹太教律令要求男人和



女人实行利他主义，“这是对伤害及冒犯我们的人一种反本能‘不自然’的限制”；还有就是“作为犹太教另一个主要异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这种压力令人憎恶，贬黜的冲动从闷烧郁积而后延烧成焰进而全面毁灭。这是身为犹太人的斯坦纳从更高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角度对两千年来持续不断的反犹情绪的探究，他承认这并不是完美的解释，“但我无法找到更好的解释”。这一章的语调至为沉痛，斯坦纳在该章末尾写道：“兽性、愚蠢、不包容总是会选择犹太人为目标，但是这是我永不会抽身离开的选民和族群（即使这是可行的）。”他还引用同为犹太人的托洛茨基的一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类社会远

景的展望，作为自己的工作清单——“人们会以主宰自己的情感为目标，把本能提升到良知的高度，使其透明……”。从中透露出的对于那种孤绝的理想毫无保留的拥戴让人为之动容。在这里，我们在那个睿智敏感的斯坦纳身上又发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勇气，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勇气作为底座，在逻辑链条上自如滑动的睿智分析也只能是一种外在的学术自恋而已，就像许多斯坦纳看不起的“理论批评家”那样。

随着对大屠杀正面思考告一段落，斯坦纳迅速将思维之触手转入对另外两个抽象概念——音乐和语言——的深入探讨。他是如此急于要展开对这两个问题展开沉思，甚至于不再像前几章那样以自己的生活事件作为某种隐喻转入对抽象问题的思考，而是直接切入——第六第七整两章几乎都是完全的思辨分析。当然，细读之后，我们知道这两章本质上是第五章大屠杀思考的余绪，它们从更深的文化角度回应着人类与生俱来的暴力倾向。斯坦纳以希腊神话里马西亚斯、塞壬和俄耳甫斯这三则深不可测的寓言故事作为案例，分析了为什么有关音乐萌发、乐器诞生的故事里，会出现如此野蛮的行径，进而指出“文字和音乐之间，存在着再清楚不过的原初冲突痕迹”。音乐对我们展开单一的主宰，在音乐里形式是内容，内容是形式，它们极为复杂和丰富，几乎可以涵盖“灵魂”。

第七章是对于语言的分析，其基础显然是斯坦纳的名著《巴别塔之后》，他

是如此重视语言问题，以至于要在他不长的回忆录里辟出专章，继续对此问题加以强调和拓展。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哲学、文学领域的众多学者几乎步调一致地关注语言问题，总体而言这是人类自省意识不断强化的结果，比如在哲学领域语言哲学的兴盛，在诗歌领域，现代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探讨词与物之间复杂的关系，都是语言意识觉醒的表征。斯坦纳切入这个问题的角度稍有不同，他自小生活在多语环境中，他同时学会了并能娴熟地运用法语、德语和英语，因此很自然地 从语言交流的角度进入对于语言问题的精深地探讨，其核心观念是：巴别塔恰恰是诅咒的反面。从巴别特故事原初的意义来说，人类使用不同的语言是来自于上帝的惩罚，以阻止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斯坦纳承认在巴别塔灾难之后，留下的是用“近似值、误解、谎言与褊狭缝补而成的百衲被。但他更强调的是“文法就是希望”，比如简单的“如果”句式（“如果我赢了乐透彩”、“如果舒伯特还健在”），就能够随意地去否定，重建，改变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另一种可能勾勒实际现实的决定因素。而多一种语言，人类就多了一种填补概念和诠释的蜂巢空白的可能，因为“多语情况而形成的经验丰富性，思想和情感的创造性，概念的渗透、精致独特性，是人类精神杰出的适应能力和优点”。对差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强调，始自第一章中斯坦纳对于童年时阅读那本纹章学入门的感受，而通过语言这个极为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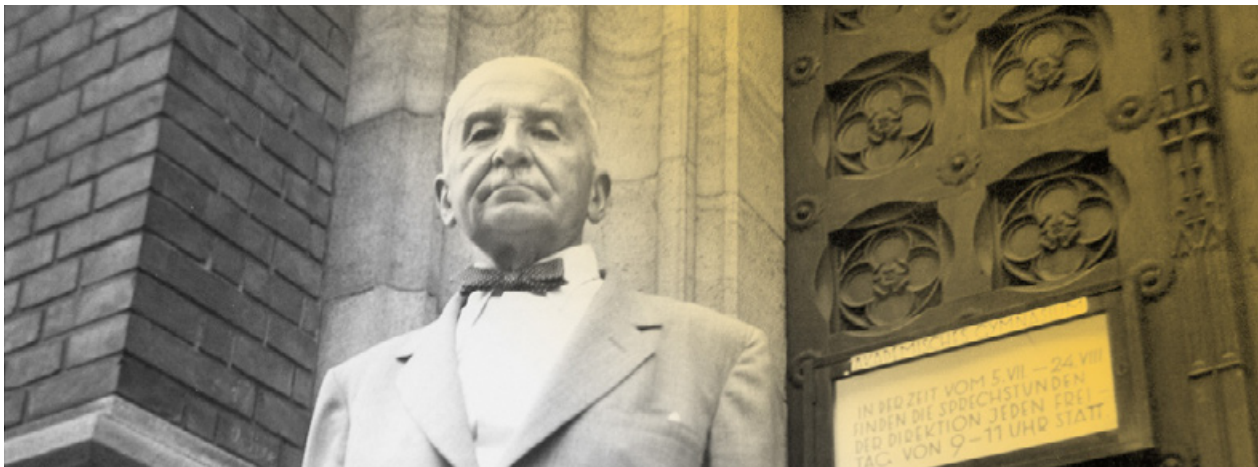
对象和媒介，斯坦纳将这个议题又在语言范畴类具体而微地加以阐释，“使用某种语言就等于是居住、建造、记录一个特定的世界环境”，相应地，一种语言的死亡就是一个世界的死亡。

经过数章高强度的理性思辨，几乎已经使我们忘记正在读的是一本“回忆录”，终于，书的最末三章又将我们带入到惯常的回忆的氛围中，高速运转的思维终于放缓脚步，使我们得以沉浸在回忆那略带倦意和幸福的光照中。对于人和事的描述在这三章中逐渐回潮，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仍旧缠绕着思维逻辑的复杂链条。在第九章，斯坦纳回忆了对自己深具影响的师长和同侪，他们多半也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布尔什、索尔拉克、艾伦·泰特、布莱克莫尔、肖勒姆、布当、弗隆恩科。写到这些旧日师长，斯坦纳的笔调也随即从先前的冷峻转为一种亲切的轻松，他甚至还讲述了他们的一些奇闻轶事，当然他也不忘在其中见缝插针地对他们的学术见解加以评论，他知道那才是他最为擅长的。第十章则尽显斯坦纳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这一章是以纯粹描述（同样精彩）带出的一组回忆蒙太奇：从有着绝美风景的N地小村落到纽约喧嚣的第五第六大道的街区，从巴塞罗那大教堂到莱茵河、阿尔诺河、利马特河边的旅馆，从伯尔尼高地到魏玛俄国士兵的墓冢……，斯坦纳回忆的触手逐一从其上细致又迅捷

地扫过，他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但我们不难感到斯坦纳对这些业已逝去之物的留恋。用文字将这些脑海里凌乱的印象熔铸成形，本身就在对抗着流逝的时间，或者可以更直率一点——其实是在对抗死亡。

所有的回忆之书大约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死亡之书，当步入暮年的作者回首往事，其实也就是在训练自己如何面对死亡。斯坦纳的回忆录当然尤其如此，整部书虽然天马行空纵情恣肆，但是有关大屠杀的思考依然悬于斯坦纳思维的核心地带，那是他的责任同时也是他情之所系。另一方面，老年那不完整的泛黄的胶片也逼使他不断重返记忆之乡，“希望我能自信满满地摆脱这种‘幼儿障碍’成熟地迈向理性、自然主义的秩序，只对理性和孤独回应”。整部书的气质是庄严的也是幽暗的，但是斯坦纳在书的末尾突然转入对爱的分析则是意味深长的，这一段话写得特别好，有着散文诗般的优美和深邃，它不是给整本书安装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是犹如回光灯照亮了整个宇宙：“爱是恨的辩证，是它的镜像反影。在不同情况下，爱是非理性的必要奇迹。爱无可妥协，就像是在它意志不坚的信徒中（受谴责的）寻找上帝一样。以一个人最深处的精神、神经、骨骼，去撼动受钟爱者的视力、听力或只是触碰；去设计、劳动，毫无止境地说谎，以触及、接近所爱的男人或女人……” 

米瑟斯 清高的自由主义老爷子



特约撰稿人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fangyizhu@gmail.com）

跟生不逢时的奥地利学派相比，19世纪的自由主义可谓踌躇满志。有洛克和亚当·斯密等人作为理论先驱，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作为现实支持，进入19世纪的时候，自由主义正处于上升期，人们刚刚从帝制中挣脱出来，不无新鲜感地看着资本主义和自由。

然而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资本主义和它背后的支持思想——自由主义，已经不再被人们那么热情地拥抱了。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困问题，也有人辩称贫困早已有之，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时期更显而易见罢了。可是无论如何，自由主义就像它过去反对的帝王专制一样，成为了反思的对象。历史就是这样一个风水轮流转的舞台，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一定死在沙滩上，却可能会穿上马甲，摇身一变成为下一个后浪，可不么，专制主义化身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又

回来了，还带来了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这些混血儿。

2

米瑟斯正是在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前浪的时候出现的，在本来就不太注重自由问题的德语地区，他自然是满肚子不合时宜。社会普遍认为，由帝制到自由市场再到宏观调控是一系列的“进步”过程，至于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式的完全掌控，还是干预主义式的部分掌控，自然还存在争议，然而调控的存在，是主流思想已经认定了的。

而米瑟斯主张市场的自然选择是唯一最好的方式，任何形式的干涉都会扰乱市场的秩序，可能会有部分人受益，但对全体人民而言是有害的。比如增加货币的投放量不会导致所有商品同时、同比例涨价，因而不过是收入再分配的手段，而多余货币投放后导致利率低于正常的利

率水平，形成投资规模的扩大，造成经济繁荣的假象。然而，实际消费和储蓄并未改变，所以这种自欺欺人迟早会导致反弹，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校正，繁荣之后必定有衰退。因此，政府对货币的干涉是徒劳而有害的。

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些国家风起云涌，而在另一些国家里，人们开始梦想着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折衷起来，也就是干预主义。米瑟斯不遗余力地批评社会主义经济，认为它必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真正的经济核算，所以必然陷入错误判断和经济秩序的混乱。他批评马克思跟浪漫主义者同出一辙，在幻想中自我满足并等待障碍奇迹般地消失掉，不可谓不尖锐。他还一针见血地点出，同阶级的“同志”之间并非和谐的互助关系，而是一种竞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召开国际大会的年代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话和口号声震云霄，但就在此时，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工人却成为阻碍外来移民的最大障碍。”

而更有现实意义的是他对干预主义的批评。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如果政府干涉商品价格，比如规定一个商品应该用比较低的价格出售，后果只有令生产者无钱可赚而压缩生产或改行做别的，这就造成该商品的紧缺，政府在这个时候收手倒也罢了，若不收手，则势必导向配给制，并强行规定生产者不许停产，这就已经滑向社会主义了。同样地，如果规定的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工资，工厂主必然想法解雇

工人。如果这时候工会跳出来干预，结果是不一定解雇现有工人，但招工必然紧缩，这只不过是维护了工会内部工人的利益，伤害的是未入会的工人。一个人在社会中，表达意见的方式往往存在着虚伪性，因此有“用脚投票”一说。而试图干涉人们“用钱包投票”的机制，必将受到来自经济规律的惩罚。那个时候还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说，因为社会主义还自信满满地认为，有了英明神武的有关部门，就根本不需要市场。我设想如果米瑟斯看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会嗤之以鼻并斥之为悖论的怪胎。

米瑟斯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着无可争辩的坚定信念。关于垄断，米瑟斯



米塞斯（又译为米瑟斯）[奥]
《人的行为》
夏道平 译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1年，NT\$7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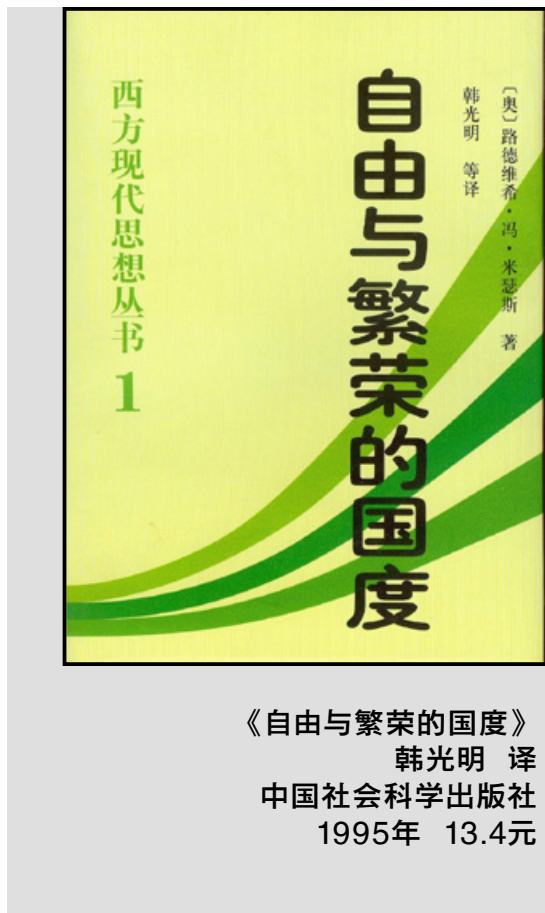
认为只有两种情况可能形成垄断，其一是国家干预，其二是涉及自然资源。他似乎并没有涉及到公司规模扩大可以节省成本，因此小企业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哈耶克倒是涉及过这个问题，但是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他只是引用了威尔科克斯论文中的一段来证明，那段话里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论证，而仅仅是反复陈述论点。对于哈耶克这样一位思路清晰、且没有故弄玄虚的不良嗜好的人而言，这种论述方式非常少见。

3

米瑟斯的思想里面有很多绝对：自由市场绝对好，绝对不要关税，不能禁止人员移民，不能干涉教育……他声言自由主义是科学的、理性的，如果能够树立一种“对自由主义无限的、毫无保留的信仰”，那么经济问题、社会稳定问题、战争问题这些永恒的问题都将统统不再是问题。

这样一个非常绝对的人，不由得让我想到罗素的自由思想十诫，第一诫就是：不要对任何事情感到绝对肯定。看到米瑟斯如此笃定，甚至暗示自由主义可以像万能药一样解决那么大一箩筐的永恒问题，我忍不住暗地里替自由主义捏把汗，生怕它万一有个什么闪失hold不住场面。

正如他的得意门生哈耶克所言，米瑟斯“武断和不容争辩”。这种文风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里多有体现。丝毫不奇怪，他说密尔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辩护士”——这句话出自米瑟斯的口中，自



然是骂人的话，就比如文革里面说某某是“资本主义的伟大辩护士”一样：这个某某听完这句话，就该自觉地夹起尾巴回家收拾点东西，马不停蹄地滚到劳改农场接受再教育去。

米瑟斯责怪密尔的妻子对他施加了不好的影响，以致于密尔“充满了懦弱的妥协精神”。不得不说，米瑟斯的“妥协”奖章实在很好拿。就连哈耶克后来也拿了一块。特别是哈耶克与波普尔过从甚密，彼此认作学术上的伙伴和精神上的挚友，这也让米瑟斯不大满意。

米瑟斯是冷静头脑和极端判断的一个令人惊异的组合。一方面，他的理论正如他所相信的那样，是理性的和科学的；

另一方面，他极度强调的理性和科学性却把他自己带入了一个武断的境地。

4

一般人谈论“主义”的时候，往往从天道、人道、幸福、正义的角度出发，而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米瑟斯是谨守本分的，他很少超出他的专业范围去谈论主义。他的核心理由是冷静而简单的，那就是：效率。不同于那些伦理上的争辩，经济规律就像物理规律一样必须尊重。正如他在《人类行为》的结尾处所说，如果你跟经济规律过不去的话，灰头土脸的不是经济规律，而是你自己。

对于废奴问题，他的出发点不是人道主义，而是效率。其实论述废奴的历史这一段，读起来就像说的是“我们这儿”一样亲切。当时不但统治者认为奴隶制是有益的，有趣的是，连奴隶也这样想。因为奴隶不必担心生活，干活就可以吃饱，大家普遍认为他们不够成熟，因此即使自由了也不知道怎么使用自由，离开主人以后就不能独立，无法实现自身价值，反而有挨饿的可能。其实虐待奴隶的主人是少数，大部分奴隶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瞧，是不是很熟悉：在老大哥的看管下，我们都没什么好担心的，老大哥说得对，我们的素质都不够，所以民主了反而糟糕，而且我们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我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老大哥似乎总体来说对我们还不错……拜托，一群奴隶怎么会有自由人那样的活力和动力，怎么能够妄想自由人的工作

效率？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如此，把他们的脑子都泡水洗过了，还幻想着创造力会死而复生，在他们中间会冒出一个乔布斯么？

米瑟斯看待和平问题的出发点仍然是：效率。战争破坏了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保护和平就是保护劳动分工，也就是保护了效率。其实，他判断很多问题诸如平等、民主、宽容之类，都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考量。相对密尔《论自由》之高举思想与个性的大旗，米瑟斯作为经济学家，他的本分则是冷静地衡量利弊，做出理性的判断。然而，他并非不重视思想与个性，对他而言，自由主义是为人类的精神生活解除后顾之忧的工具，因为它保障了物质的繁荣，人类才可能发挥个性，追求精神上的实现。

5

从以上意义而言，米瑟斯是相当现实的，然而他又是一位相当理想化的人，他对我们平常人所说的那种“政治”并无兴趣，斥之为“自称为策略、外交手段和妥协的谎言”。米瑟斯对于各党派之声称以人类普遍幸福为目标的说法颇为不屑，因为大家都是说的比唱的好听，而在漂亮的诺言无法兑现的时候，就往外人头上一推，比如“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名鼎鼎的“境外势力”再次出场。

他认为自由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自由主义不是通过其追求的目的，而是通过它选择的方法去达到这一最终目的



的”。自由主义犹如风清扬的无招之招，不应建立任何党派，也不代表任何阶级而是代表所有人的长远利益。他认为所有党派都是为小集团服务而伤害全体利益的，他并不承认代表各个集团的党派之间的博弈与斗争是一种平衡的方式。他刚直不阿地拒绝了蛊惑煽动那一套所有党派都在实施的套路，而认为启蒙是唯一能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

米瑟斯的理想化也表现在他对理性的推崇，他认为人类（至少启蒙了的人类）能够按照他们的最大利益选择自由主义。在《社会主义》一书的序言中，哈耶克很想说这个才是米瑟斯真正的想法：

“我们之所以采用自由制度，并不是因为我们理解了他的益处；社会秩序亦非出自我们之手，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去设计它；只能说在对它的作用机制做了长期大

量的观察之后，我们已经部分地学会理解它。”但其实哈耶克在这里似乎有点一厢情愿，他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而非他的老师的思想。事实上，米瑟斯认为过去的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在于过于信任人类的思维能力和洞察力，不能判断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因此需要启蒙民众，而启蒙后的民众会认识到自由主义政策的必要性，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他对理性寄予绝对的信任，然而人民作为一个群体，即使是启蒙了的具有理性的群体，是否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如他设想的那样伟光正，是值得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6

米瑟斯就是这样一位清高的老爷子：他不会为了高尚的目的而去暂行猥琐之事，比如用口号和偶像去发动群众，

或寻求党派的势力以求实践自己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又坚信自由主义思想终将获胜。他是纯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社会活动家。可是，如果不诉诸感情而寄希望于民众的理性，在现实中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在目前的世界，中肯地阐述问题和具体方案，不如高喊“yes we can”，这是一个悲哀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或许启蒙是一个不知需要历经多少代人的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或许真理来到人间总是以一种我们所想不到的方式，但它的使徒因为拒绝妥协，往往需要付出代价。

在法西斯主义势力暴涨，而社会主义方兴未艾的日子里，自由主义似乎山穷水尽，在这一思想大环境下，米瑟斯这个十分绝对的自由主义者处处碰壁。作为一位已有巨著出版的学者，他在维也纳大学却拿不到教授的职位，只当了个不拿薪水的副教授，不得不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维持生计。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私人举办的研讨会却异常成功，堪称哲学家甚至科学家的摇篮。物理学界也有类似现象，卢瑟福本人不但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伯乐，善于挖掘学生们的潜力，他手下出过玻尔、狄拉克、查德威克等数十位诺奖得主，他的实验室堪称诺奖的幼儿园。与卢瑟福的实验室相比，米瑟斯的研讨会则是一种更为松散的形式，与会的人们并非他严格意义上的门徒。他的研讨会两周一次，通常是整晚的讨论，非常难得的是，米瑟斯并不

期望他的观点被全盘接受。然后他们一起去夜餐，然后再到咖啡馆讨论到凌晨方散——在我这样的后生小子看来，这种富集了精神碰撞的聚会仿佛是那些白衣飘飘的年代所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据说米瑟斯的人格魅力出众，堪称知识分子的典范，从他的研讨会走出来的名人名单很长，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数学家卡尔·门格尔，政治学家埃里克·沃格林——沃格林后来继承了米瑟斯的坎坷命运，也成为了政治哲学领域的一位边缘人。

1934年纳粹进军维也纳，当晚就急不可耐地扫荡了米瑟斯的家，好在跑不了庙却跑得了和尚，他不久前刚刚流亡日内瓦。1940年，老迈的米瑟斯来到美国，在奥地利令人唏嘘的一切又开场了。当时美国的主流是凯恩斯主义，强烈反对干涉主义的米瑟斯处处碰壁，直到五年后才拿到一个可怜的纽约大学临时客座教授职位，同样地，纽约大学不提供薪水，他的薪水由一个私人基金会提供。即使他出版了《人类行为》这样的巨著，纽约大学还是一直把他当作二三流经济学家对待。再次地，他又开始举办私人研讨会，再次地，他的研讨会又成为了名家的摇篮，这回最有名的一个大概算是他的忠实门生穆雷·罗斯巴德。奥地利学派在美国从此扎下根来，直到米瑟斯逝世一年之后，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也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认为不可能的滞胀现象在70年代发生的事实，奥地利学派才重新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正如时装界把女人的裙摆一下子拉长，一下子剪短一样，时代精神也有着类似的潮流，而后者相比前者似乎更为残酷，因为它颇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味道。当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被渐渐抛弃，新兴的很多自由主义流派其实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在这个时候，米瑟斯堪称逆流而动的少数派。夏道平先生在台版《人类行为》的译者序中写道：“不朽的名著，没有‘失效’问题，因而也没有过时的翻译，有的，只是无常的‘时运’。”而我在这里还想加一句：流行的理论固然掌管着现在，而少数派手中往往掌握着未来。

时运不济的米瑟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本想做一名改革者，却变成了一位崩溃的历史记录员。”他不像他的学生哈耶克那样幸运，能活着看到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他是这样一位不走运的先知，终究未曾等到自己的预言实现。在他身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接了他的班，继续主张自由市场和小政府，而它的论敌也叫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是凯恩斯的思想后裔，主张高福利，“政治正确”地关心着贫民利益。这两种思潮之争，就像是紫霞和青霞一样，怕是要换着马甲永远这样纠缠下去了。Q

帕斯提奥的双重魔咒



特约撰稿人 罗四翎 (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1

1949年,忧郁的阿多诺在其论文《文化批判与社会》最后写道:“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年,流亡多年的阿多诺返回德国。而他的命题却从此争论不休。对此,诗人恩杰斯贝格在评论犹太裔诗人萨克斯时说:“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反驳这个命题——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命题,只有少数人能做到这一点,而萨克斯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对于这个反驳,阿多诺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辩证法》中不完全地修正了他的命题,承认“这也许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哲学家阿多诺对他那个时代“最强硬的判断”似乎依然是一个可怕的魔咒,这可由一串自杀的名单来证明:1951年,没有死于毒气室的波兰诗人布洛夫斯基开煤气自杀;1970年,用诗化的语言成功再现了集中营中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奥地利诗

人保罗·策兰从塞纳河米拉波桥上跳下;1987年,极有可能获得这一年诺贝尔文学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作家莱维自杀。在我看来,从另一个阵营的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也未能逃脱这个“魔咒”。

1945年二战结束之时,有8万名17至45岁罗马尼亚籍德国人被装在运牲畜的车厢里,运送到苏联的劳改营。他们在那里要像牲口一样劳作,为罗马尼亚的纳粹追随者抵罪,直到1949年才得以还乡。在这里面,有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的母亲。“母亲为我梳头时,她会告诉我她的头发是如何被剃光的;她不会告诉我她在劳改营怎么学会的,但她会教我如何给土豆削皮,把皮削得很薄很薄,不会有任何浪费。”五月初,在纽约参加“2012年笔会:世界的声音”国际文学节的米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此时,适逢她的小说代表作《饥



饿的天使》(THE HUNGER ANGEL, Metropolitan Books, April 24, 2012, 中译名《呼吸秋千》, 2010年10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推出英译本。这本小说正是以这段特殊的历史和鲜为人知的劳改营为背景的。在米勒的童年里, 这个劳改营几乎是挥之不去的存在, 其中就有“赫塔, 这个可怕的名字。”“我的这个名字来自于我母亲在劳改营里的一位朋友。她死了。我的母亲向她承诺, 若是她有女儿, 就用她的名字。这件事不是我母亲告诉我的, 而是我的祖母告诉我的。那时, 我还很小, 我还不知道劳改营是什么, 但我周围的东西都与劳改营有关。”

此外, 在被押往苏联劳改营里的还有小说主人公的原型、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帕斯提奥1927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锡比乌市, 作为德国人

的后裔, 他的家族一直说着祖先们的古老德语。多年后, 成为了诗人的帕斯提奥说, 这种双语环境, 不仅让他洞察写作的可能性, 更是让他看到“教条思维的局限性”。1945年, 17岁的他被送往苏联劳改营, 在那里, 他渡过了五年可怕的生活。

六十年后, 已经是77岁高龄的诗人帕斯提奥与赫塔·米勒合作, 将自己的那段经历写成小说, 他还曾特意带米勒去看如今位于乌克兰境内的那所集中营。2006年, 帕斯提奥获得德语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 专程从柏林赶到法拉克福书展出席书展之后的颁奖仪式, 并拟在书展上与米勒一起朗读他们合作的小说。当时该书已给“慕尼黑翰瑟出版社以包揽帕斯提奥著作出版权的方式, 准备于次年出版”。然而就在书展开幕前一天晚上, 帕斯提奥因心脏病发, 在借宿的友人

家中的沙发上去世。小说未能如期出版，米勒在后记里解释，由于伤心过度，整整一年未能动笔。2009年8月，小说出版，署名赫塔·米勒。该年10月，米勒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对于集中营的幸存者帕斯提奥来说，这个巨大的荣誉却是一个“野蛮”的生命无法承受之重，且仅仅是阿多诺“魔咒”的第一重。

2

2010年9月，慕尼黑大学学者西纳特公布了他在罗马尼亚安全部里找到的帕斯提奥的秘密档案。同时，帕斯提奥鲜为人知的生平也浮出水面。1949年从劳改营返回家乡后，帕斯提奥写了一些诗歌揭露劳改营生活，并批评苏联，并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危险的资料，帕斯提奥非常清楚这些。1955年，他将这些诗歌复制了一份，保存在他的一位朋友那里，并向朋友发誓，他会保守这个秘密。然后他烧毁了自己的诗歌，去了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大学学习德语文学。在大学期间，他很快又陷入危险的境地，因为他总是和一群资产阶级诗人和作家在一起“鬼混”，很快引起了秘密警察的兴趣。他们跟踪到了他的老朋友，并找到了那些危险的诗歌，然后用莫须有的罪名判了他的朋友七年监禁。接着，他们直冲帕斯提奥而来。

在秘密警察四年的监视威胁下，帕斯提奥妥协了，1961年6月6日，他签下了一份“线人声明”，接受代号“奥拓·施泰因”的线人工作，此时他已经大学毕业到



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工作。不过，令研究者西纳特奇怪的是，在帕斯提奥的秘密档案里，除开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外，并没有发现帕斯提奥提交的任何“报告”，而那张纸上所写的内容显然是“用来对帕斯提奥施加压力的”。与此相反的是，秘密档案里却有着大量“告发”帕斯提奥的“报告”，他的同学、大学老师、朋友，甚至他的母亲似乎都在告发他。“很显然，帕斯提奥害怕了。他的生活里到处都是叛徒。”此外，有研究者指出，帕斯提奥害怕的另一个原因是，尽管他结婚了，但实际上，他与小说中的少年雷奥一样，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害怕这个被人发现，并受到迫害。”因此，他深藏自己，他在秘密警察那里走过场，身边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内心世界。

1968年，他拿到一个奖学金去维也纳，然后趁机去了西德，一开始住在慕尼黑，然后去了西柏林，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对于他的逃亡和“工作表现”，罗马尼亚国安局在12月13日做了一个“结论”：在与我组织合作中，“施泰因奥拓”未表现出兴趣，只做表面应付。今年四月，他受歌德学院邀请，赴奥地利学习创作德语诗。“施泰因奥拓”从奥地利进入联邦德国，拒绝返回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建议从线人网里删除“施泰因奥拓”，批准对他展开调查。（可参见王容芬《德国文学界的一桩公案》，《读书》2011年2月号）

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战斗了大半生的阿多诺曾小心提醒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决不仅仅是由纳粹主义所引起的例外的“野蛮”事情。将数百万犹太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罗姆人、少数民族等全部屠杀的集中营是前所未有，不过，对阿多诺来说，更为可怕的是这种野蛮的杀戮所表现出的“理性”与“科学”，即在“野蛮”之中表现出的“文明”——集中营正是人类知识内部制造出来的，人类应该如何抵御呢？阿多诺没有给出答案，但他指出：“收容所中死去的不是人，而是样品。”在集中营中，所有的人都等同均一为物体，所谓“个性”与“个人空间”是完全不存在的，人完全被“同一化”。在阿多诺看来，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极端的对个人生命的漠视，正是西方文明几千年来追求同一性原则发展的必然结果。

“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



赫塔·米勒 [德]
《呼吸秋千》
余杨、吴文权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29元

学原理就是死亡！”

且不管阿多诺的结论是否过于绝对或是悲观，至少他提醒我们对“同一性”的警惕，不管这种同一性看上去多么美好、多么光辉、多么理想，但只要个人空间消失，人便会消失，集中营以及杀戮便会出现。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野蛮的，有时更为野蛮，正如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感叹，就镇压国内人民而言，史塔西（东德的国家安全部）比盖世太保更可怕：“盖世太保以4万军官监视国内8000万人口，而史塔西用10.2万名官员控制1700万人。”纳粹的统治维持了十二年，而史塔西的秘密统治长达四十

年，不仅监控一切涉及政治的活动，而且还肆无忌惮地侵入到人的私人领域，甚至是最隐秘的地方。

与之相比，罗马尼亚安全部的秘密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1989年，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执行枪决；二十年后，早已在1987年移居德国的赫塔·米勒依然无法忘记罗马尼亚安全部给她带来的恐惧。2009年，在经过多次申请之后，她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档案。7月23日，她在德国、《时代周报》发表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罗马尼亚安全部：除了名誉，什么都有》（见《香港文学》2009年12月号），叙述了罗马尼亚安全部与之后的罗马尼亚情报局对她进行的长达二十多年监控与毁谤。在安全部的档案里，米勒的名字叫克里斯蒂娜，三卷，914页，建立于1983年3月8日，一共出现了三十个特务的名字。1986年11月30日的档案记载：“克里斯蒂娜的每一次出行，到布加勒斯特或是我国其他地方，都必须及时通知”，以便对其实行“永久的控制”。而档案里的“半数材料都是我在我们的公寓房里装了窃听设备截获而来的。”“窃听报告上常常是写满了空空的括弧，那是因为播放唱片的音乐扰乱了窃听。”“凡是住在我们那个十层楼高的住宅区的每一个人，国家安全部都调查了他们的职业、工作单位以及政治上是否可靠，并且给每个人都建立了个人档案。”“窃听报告要每日必报。窃听到的谈话要写成摘要，然而那些‘颠覆性言论’的只言片语是要逐字逐句记

录在案的。”甚至在米勒离开罗马尼亚移居柏林一年后，依然有特务到她家监控，

“详细地描述了我们家公寓房的格局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除了“审讯”、“在大街上被直接拉走”、“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逮捕（“多亏了公众对我的作品反映强烈，加之我在德国获得了好多文学奖，这个计划才从来没有实现，我也没有被捕”）以及“被自杀”的威胁外，“因为我拒绝当特务，他们就认为我是特务，这个事实比企图录用我为特务和死亡威胁更为糟糕。”于是，米勒在她的档案里成了“国家公敌”，西德派去的特务。乃至1989年之后，罗马尼亚情报局取代了之前的罗马尼亚安全部之后，还用着“世界上所有时间”来整理她的档案，捏造了一个幽灵来损毁她的名誉。“不管我走到哪里，他们不仅会随后把这个幽灵派到那里，而且还会在我之前匆匆赶到那里。尽管我从一开始就写文章反对独裁统治，而且一贯如此，然而这个活人的幽灵依然是我行我素。它已经呈现出它自己的生命了。”

在罗马尼亚安全部，米勒的档案归类在“巴纳特行动小组”里罗马尼亚裔德语作家的档案里。“国家安全部对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都设有专门的部门。管德语作家的部门叫做‘日耳曼民族主义分子及法西斯分子’，匈牙利语的部门叫做‘匈牙利国土收复主义者’，犹太人的部门叫‘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只有罗马尼亚语的作家们才有幸放在‘文化艺术’部门的监管下。”在这里，人已经渐渐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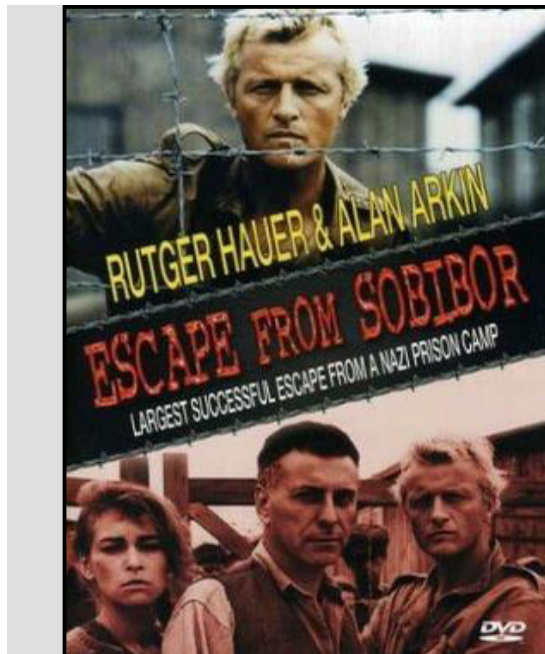
失，一个更为庞大的集中营若隐若现。对此，1987年，米勒与同是作家的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移居德国。而在1968年，与米勒一样同是德语作家的罗马尼亚人帕斯提奥只能踏上一个人的逃亡之路。

到了德国后，帕斯提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德国机关和美、英、法三国有关部门自首，交代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此后，他似乎从未向任何人提起，他的朋友、他的编辑，甚至是赫塔·米勒，他都未曾提及此事。他沉默低调，孤身一人，没房没车，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写着天才般的诗歌，四十多年来共出版诗集四十多部，并获奖无数。他去世后，其遗嘱将其全部积蓄建立帕氏基金会，并指定了包括米勒在内的管理人。基金会每两年颁发一次四万欧元的帕斯提奥奖金。

不过，在其遗物中却发现一张2001年关于罗马尼亚国安局的谈话稿，谈及自己这件往事：“我不打算想、也不打算说一句话抬举这种从机关到实现其目的都令人恶心的玩意儿……我在三十四年前就已经主动向这些部门做了交代，毫不保留——也是为了清算，使我能有一个重新做人的疗伤过程，把这种恶心玩意儿扔到阴曹地府，见鬼去！”（王容芬《德国文学界的一桩公案》）

3

然而，对于帕斯提奥的沉默，米勒感觉“像打了她一个耳光”，在帕斯提奥档案公布后，她表示说，“只知道帕斯提奥



向德、美、法、英当局交代过，以为只是挂名线人，没想到他真告过密，决定不再袒护他。”并宣布：“我们将在帕斯提奥基金会里设一个专案组，对帕斯提奥展开全面调查。我们现在必须以帕斯提奥为例，展开对专制统治下，作家与秘密警察勾结的调查，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王容芬《德国文学界的一桩公案》）

在纽约“2012年笔会：世界的声音”国际文学节上，米勒似乎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她说，尽管只发现了四件告密材料，而且写得都比较含糊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小说中所描写的阴谋与背叛在生活中真实出现时，她感到非常震惊和难过。

“他和我是很亲密的朋友，我无法想象他真的那么做过。”不过，她觉得要考虑

到当时特殊的环境：“在1950年代，如果你不那么做，那就得做20年的牢。所以，我可以理解，你刚从劳改营出来，难道又回监狱呆20年吗？这是一种可怕的敲诈。”“假如在他去世前，我知道这件事，我可能会放弃这项合作。不过，若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现，我和他一直合作下去，这将多么可怕！”

在《纽约时报》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惊呼，这个米勒太野蛮了。同样是这篇文章（《Naming Her World, Part by Part》，2012年5月18日），也提到了米勒在罗马尼亚国安局的秘密档案。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一位罗马尼亚出生的学者瓦伦蒂娜·格拉加，曾将米勒早期的一部小说《单腿旅行》翻译成英文，也曾考察过一些米勒在秘密警察局的档案，并惊讶自己的发现：“我印象最深的是，档案里的许多事情已经在她的写作中艺术地表达出来了，她的写作是如此的真实。和其他人一样，我很吃惊，她身边的许多人都不得不告发过她：她的邻居们，蒂米什瓦拉一家戏院的主管，她曾教过书的一家幼稚园的老师，她还一直把这位同事当作是朋友。”文章将二人两相对比，褒贬不言而喻，这让我更不由再惊呼，这个《纽约时报》野蛮了，野蛮了！且不说文章未对帕斯提奥做线人的事情进行任何背景交代，单这种对幸存者过于轻率的对比与谴责就过于野蛮了。

柏林墙倒后，东德国家全部里的秘密档案有21.25亿页，连在一起长达201公里，涉及约600万人。历史学家加

顿艾什决定挨个寻访他档案中出现的线民，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极权统治的奴仆？然而寻访的结果却是没有一个是邪恶的，一切都是“人性，太人性了”。“每一个被采访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因政治言论获罪，为了自保不得不做线民；有人因性倾向被要挟；有人相信自己是在保卫国家安全。”（《真相的救赎》，2010年6月《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电影《逃离索比堡》中，纳粹军官让十四位未能成功逃亡的囚徒在被处死之前选择一位陪死的同伴，若是拒绝选择的话，就会殃及更多的无辜，赔死的不是十四位而是五十位。帕斯提奥无疑便是这样一位逼迫做出两难选择的囚徒。与前一段“集中营”经历相反，面对这一段“集中营”的经历，幸存者帕斯提奥选择了沉默。面对他的选择，我们唯有尊重。因为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个命题，只有集中营的幸存者才有资格做出回答。置身其外的，唯有尊重，否则才是真正的野蛮。

实际上，相对于身家清白、慷慨激扬的米勒，背负着双重魔咒、一辈子都在沉默中忏悔帕斯提奥更能触动我。比帕斯提奥小一岁的罗马尼亚裔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厄瑟尔的小说《昼》中有一个这样的“我”：“我将自己当做一名死者，我不能吃、喝、流泪——因为我是一名死者。我将自己想象为一个死人。——死后的梦中，我是一名将自己想象为生者的死者。”帕斯提奥很容易让我想起这个“将自己想象为生者的死者”的

“我”。此时，他再次落入阿多诺的“魔咒”。对于诗人恩杰斯贝格的反驳，阿多诺的回答实际上是这样的：“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因此，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不为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特别是那种偶然的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应被处死的人能否继续生活？” 

情欲背后的伦理与权力



特约撰稿人 米格 (广州, pangming@gmail.com)

2012年4月,香港歌手黄耀明在“达明一派”演唱会上首次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赢得全场如雷掌声。但早在1988年,当何式凝得知自己的中学同学兼好友黄耀明的同性恋身份时,“世界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截然不同了”。

如今,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何式凝已经是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的副教授。男同性恋者、师奶、多元化伴侣、抑郁症患者,这些“离经叛道”的另类边缘人群,都在身为性与性别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的何式凝的研究范围之内。但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源自那个天翻地覆般的夜晚,源于“我开始明白,生活的真相远比它展现给我们看的表面复杂得多”。

最近,何式凝博士将自己二十几年来关于情欲、亲密关系、身份认同等研究议题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论文结集成册,同时以英文版和简体中文版发行,以此总结她在性与性别范畴的学术历程。在

这种“一力奋战”的过程中,何式凝博士经常在与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曾家达的学术合作与理论交流中受到启发、相互扶助、共同前行,因此这一合集也收入了两人合著的若干文章。

日常语言的穿透力

合集《情欲、伦理与权力:香港两性问题报告》共包括导引、身体、身份认同与权力、关系多元性及欲望等四个部分,收入的各篇文章都在访谈和口述史等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质性研究和实证主义分析,反思和挑战了居于垄断地位的西方主流学术思想。事实上,这四个部分的内容涵盖和反映了一些纵贯全书的主题:香港人如何体验殖民性、殖民统治、权力操演?这种体验与统治如何受到种族、性别、性取向以及阶级的影响?香港人如何超越物质、符号、肉

身与精神去定位自己？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如何在具有多重偶然性（multiple contingencies）的世界中去感受与经历矛盾复杂的人生，并尝试在吸收和整合的过程中寻找意义？

两位作者曾经尝试以西方的性语言去捕捉与描绘人们生活经验的实情，但很快发现源自西方的精英话语以及解剖学与生理学的医学语，未必能在多样化的语言实践中精确、完整、契合地做到心有所念、语有所指。于是，普通人所使用的非正式的日常用语会夹带着无法抽离的私人情感甚至不堪入文的口语，以此去理解和组织自己的生活世界，并表现出“创造性与颠覆性潜能”。这种巴赫金笔下的“众声喧哗”，体现的恰恰是实际生活中语言体系的局部性和不完整性，并折射出日常生活本身的“不可预知、波澜不惊和变故良多”。

两位作者谈过一位年近五十的华人女性，她忆述了自己与前夫相处时感觉最为强烈的一瞬间。他们在婚后很少有机会单独外出，直到有一次，两人需要一起出席某位亲戚的葬礼。她在回忆自己先乘坐小巴到丈夫的公司、再一起乘坐出租车前往殡仪馆时，如此坦诚自己的感觉：“就算只是说出来，我也觉得尴尬。为什么那次去葬礼，我会觉得那么开心？当我与他坐进出租车时，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我期待这个时刻已经很久很久，就好像我要去约会一样。”

毫无疑问，这段叙述可以在现有理论的不同框架下进行解释，将欲望的增



何式凝 [中国香港]、曾家达 [加拿大]

《情欲、伦理与权力：
香港两性问题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9月，59元

Sex and Desire in Hong Kong

by A. Ka Tat Tsang and Petula Sik Ying Ho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012, HKD195.00

强视为欲望被剥夺的补偿性结果，或者说这反映了夫妻间的权利平衡关系，或者说这体现了心跳加速与情欲经验体现的关系、说明了女性身体的肉体需要、表现了性爱与死亡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真正打动了两位作者的，“却是她所使用的语言的简单朴素、她所感受到的张力的直接有效以及她这一经验的情欲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女性通过令人着迷的、“杂语”式道出的个人叙述来成功地表达了自己，活灵活现地表现了社会规训与个人需要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而这些话本来是难以启齿的。

身份认同也是权力

当然，关于性与性别的论述，并非永远是微观的、琐细的、碎片化的。两位作者在探讨香港男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繁衍流变”时，并没有将男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局限在对婚姻、家庭、性与社会性别角色等文化定义上，而是从法律、伦理、社会等层面上对香港这座“看上去西化的大都市”进行检视。他们敏锐地发现，在这样一个由男性主控的、为“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男人”下了定义的社会里，男人在实现社会期望和家庭期望方面承担着繁重的义务，需要在压力环境下实现成功、强大、独立，以便支撑起整个家庭。“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成为这一类人，可能会被拥有这些品质的男人吸引”，于是男同性恋者会决定和什么样的人约会，并决定应该将什么样的意义带入这些关系中，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得到了社会地位、意义与关系，可以与社会抗争，批评爱、性、婚姻、家庭等方面的主流价值观。

有趣的是，当同性恋者的标签之从“同性爱”、“基”、“基佬”、“豆腐婆”、“基婆”逐渐变为“同志”与“女同志”，同性恋的身份成为了一个更“有市场的”标签和产品。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被归入这以社会类别之内，并享受与之相联系的“西方化、自由、先锋前卫、少数派成员等形象”，变得“稀有、与众不同、高深莫测、超越常识，还有着特殊的品位和生活方式”。简而言之，他们希望自己不再是

个“平凡普通”的人，哪怕会因此而遭致社会负面的评价与歧视。

更重要的是，“性的身份认同就是权力”。两位作者在梳理港英当局治下的香港同性恋运动后发现，政治运动有时不一定需要采用组织化对抗或是制度改革的形式，“那些不去投票、不注册为选民、不正式参与任何组织、不在公众论坛发表自己看法的人们也有可能是政治行动者，这甚至包括了那些明确表示自己政治毫无兴趣的人”。这些人可以通过坚持非常规的生活方式或者通过坚持多种身份认同来参与到政治领域中，违逆日常习俗、扰乱既定社会秩序或者质疑现存的社会规范，借以削弱政府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权威影响力，“带来政治场所的多元、政治空间的生长、抗争策略的增强以及民主运动领域的拓展”。

“未曾走过的人生道路”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两位作者选择性和性别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正正是用心良苦。因为性渗透在各种个人经历和社会活动中，位于日常与异常的交界，看似无色无味，但一旦显露与爆发出其颠覆性，就有可能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勇气和决心去超越各种既定的界限。

在现实当中，性受到社会体制太多的压制与歧视，被社会的各种规条、规范、规则刻意隐藏，“既有的性别角色依然存在，家庭与社会依然对那些无法按

社会期望的方式与标准去生活的男女施加压力”。因此，深入了解人的性选择、性经历、性行为，坚持探求性为身份、关系、思想等带来的细微裂缝，并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窥视欲，而是为了探究性被隐秘化、污名化、禁忌化的过程，从而更好地了解整个社会真实的一面，并让我们看清自己内心深处的潜能与悸动，人性的坚韧与脆弱。

多年以来，两位作者都提倡与重视种种“越界”/“出界”（transgression）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对象从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其实都有相同之处：没有谁甘愿成为完全被驯服的个体（docile body）；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采取不同的抵抗策略（strategy of resistance），挑战社会的既有观念与规范。通过研究“自己未曾走过的人生道路”，接触“与自己贴近、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研究对象，两位作者期望能更好地认识了解自己，接受新的“身份”考验。

事实上，性只不过是一个切入点，“和其它方式的自我表达和自我书写一样，都是认识自己、创造自己和超越自己的途径”，正如在性行为、性身份、性取向、性关系方面的选择，只不过是种种人生抉择中的一面。诚如何式凝博士所言，我们如何作为一个有性别的个体（gendered being）在社会上生存？我们如何在人生舞台上找出适合自己的关系模式和思维模式，更有个性地演绎合乎自己性情的剧本？

何式凝博士曾被一名同性恋知名人士拒绝访问，理由是“我信不过你这支笔。你有没有进过男更衣室？”正是来自外界的这些意见、看法、异议与挑战，帮助作者去反思和质疑，而不是全盘接受既有的概念与理论。其实，这已经不拘泥于性与性别研究了，而是与种族、生活方式、宗教、艺术、政治取向、职业等其他论争范畴有关，或者更一般地说，与人生的存在、反抗、颠覆以及改变等各种可能性有关。

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

我有幸为本书的简体中文版进行译校，并亲身感受到何式凝博士精益求精、数易其稿，不断诘问和反思学术界固有的条条框框，同时不断尝试和采用新思维、新理论，努力创造更广阔、包容和开放的讨论空间，增进学术发展与个人历程之间的相互理解，建立中文学术世界与英文学术世界之间的联系与交汇，促进知识重建、社工介入与政策规划。另一方面，我也得以近距离了解到何式凝博士如何在面对个人的、宏观的、学术的转向时重新定位自己，如何探求知识以解决自身的疑问，“找到一种能让自己隐忍求活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如何曾“为了一种爱，为了一段情，为一个人”，而义无反顾地从社会工作领域转向更为形而上的政治哲学研究。

“理论绝不是冷冰冰的、抽离所有个人因素的工具与手段；它源自鲜活真

实的生命，有血有肉的生活”。何式凝博士明确指出，一个尊重知识的学者应该有勇气去承认，“自己对某种理论的选择、认同与支持，源自个人的执着与因缘”。正因如此，她才会通过研究Sex、Gender、Sexuality、Desire这四个相互联系、彼此关涉、难以处理、难以翻译、难以捉摸、难以言说、难以定义的术语，尝试超越当下的、转变中的世界（the world of becoming），深入地去理解本质的、客观的、存在的世界（the world of being）。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涉及的性别研究领域及其研究视角、策略，尤其是大量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中国内地读

者来说是不多见的。何式凝博士曾多次强调，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既艰巨又微妙的、“手艺式”的技巧，类似于那些只能靠师徒传承才可以保留下来的“非物质性遗产”：她常常不得不“一个人在家做学问，一个人外出进行田野调查，一个人接触为数不多的受访者和研究样本，一个人开展深度访谈，一个人与曲折的书写过程和投稿流程相抗争”。但正是这一看似孤独的、内省的过程，让自己的学术思想被反复加工、雕琢磨治，让自己的研究对象展现出鲜活的、细腻的、人性的肌理。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的融合、人生哲学与学术逻辑的统一，或许正是学者应追求的最高境界罢。Q

本土意识与台湾想象

观察员 成庆（上海, veron.cq@gmail.com）

出发去台湾前，接到父亲的电话，嘱我一路多加小心，因为“听说台湾很乱”。我一听很惊讶，连忙追问这一印象从何而来，父亲答为当地一些组团前往台湾旅游的熟人所言，并且还接着发挥，国民党如今“野心勃勃”，伺机想在政治上反吞大陆。听到这里，不禁哂然，韩寒所感受到的“太平洋的风”，显然无法吹到内陆山野之地，对于生长在红旗下的老一辈而言，台湾虽已无“匪”名，但似乎依然是“亡我之心不死”。

这种反差极大的台湾认知，显然会让人追问，“台湾”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大陆与台湾两地不同世代的人而言，当然会有不同的理解与想象，或来自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缘，或因急迫的现实地缘政治，或是长久不自觉的意识形态习惯。以至于就算当我们亲自踏上这块土地，也会从同样的景观中得出迥然不同的观察。这种视角的差异，显然主要来自大陆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高度分裂的思想背景。而这种“以己揣人”的台湾印象，常常会傲慢地视台湾为中国大历史背景下的遗珠之地，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此地在层层历史记忆下所形成的各种自我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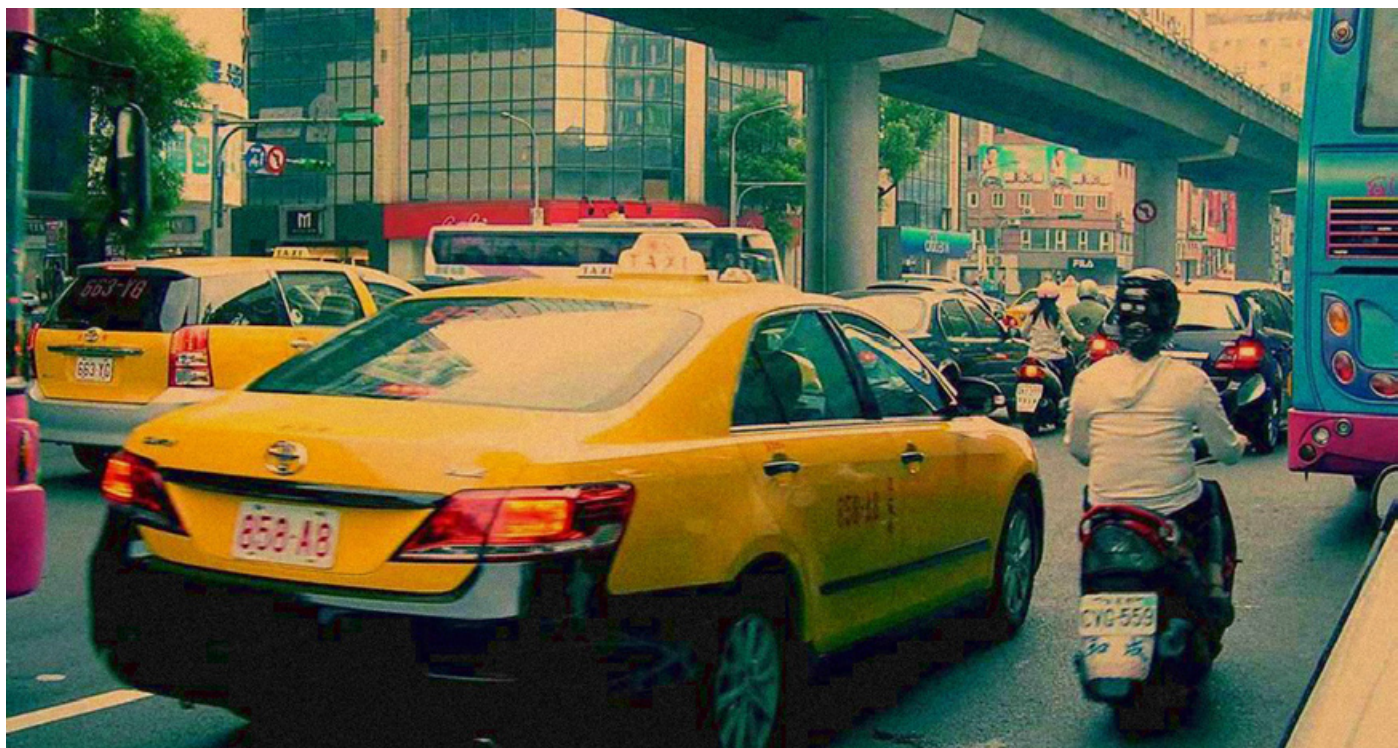


当真正站在这块土地上，除去中正纪念堂还能觅到一丝“中华民国”的气息之外，在大部分时间，我很少遭遇到政治层面的经验冲击，无论是在台北，还是在台南与高雄的乡间，非但没有体验到想象中的“深绿”敌意，反倒不断感受到各种诚挚的善意与热情。与我交谈的当地人，他们的关切基本上停留在日常生活层面。姑且不论国共恩怨，就连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纠葛，也少见提起，台北与台南反倒是不断提起的参照系，至于大陆，反倒似是一个不重要的配角。

这种“不重要”，或许会让部分大陆客的“大陆中心主义”隐隐感觉不适，毕竟对于他们而言，台湾要么寄托了“中华”乡愁，要么是“大一统梦想”的目

标，一旦在这里只看到了某种安居乐业的“本土意识”，除开艳羡之外，也难免会因这种疏离而感觉不安。在台南，与一位从未去过大陆的民宿小妹聊至深夜，她对大陆充满了各种符号化的认知，对陆客怀抱着一一种陌生的怀疑，反感于他们的粗鲁无礼与冷漠，但也对大陆经济崛起充满了好奇，虽然我给出的种种关于大陆变化的解释仍然让她困惑不解，但是我们的交流，明显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困扰，类似的感觉也同样贯穿于在台湾的所有行程中。

又如在台南搭乘出租车时候所遇到的司机大叔，除了向我们这些大陆客介绍各种特色景点外，谈论最多的不是大陆，反倒是台南与台北的差异，例如台南



保守,台北现代等等。这样的感受并非孤例,在路边曾偶遇一位好心人载我们前往台南车站,虽然她明了我们的大陆客身份,但谈的更多的也大抵是台北与台南的区别。或许在他们的心目中,台湾一地的内部差异其实远超他们对于大陆的理解渴望。不过在对岸人看来,这种浓浓的乡土意识和本地意识,常常显得与某种中国意识不合拍,为何当我们寄托了那么多“团圆”的期待与渴望,你们却似乎总是表现出安于一隅的无视?

当然,他们或多或少会认为与大陆的交涉不可避免,在高雄遇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是典型台湾南部人,儿媳妇却是大陆新娘,他拥有典型南部人的热情性格,大谈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转变,认为大陆与台湾的交流不可回转。但这背后,大抵仍从百姓的安居乐业角度出发,和政治层面的“本土意识”有多少直接关系,或许难以匆忙得出结论。

我们并不能认为,“本土意识”就一定等同于“台独意识”,我更宁愿将其视为一种中国历史中常常能看到的“乡土意识”,或许那应是地方自治程度的某种表现,因为当一个国家时时刻刻都笼罩着令人亢奋的国族情绪时,反过来其实也凸显了社会自主意识的局促与狭窄。

这种乡土意识,不仅体现在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上,也存在于台湾的宗教信

仰生活中。当来到台北著名的霞海城隍庙与龙山寺,立刻被那种热烈而有序的信仰气氛所淹没,这种活生生的民间生命实践形态,本是中国“三教合流”传统的典型表现,而这于大陆而言,只存在于故纸与想象中,这种种本应由民间社会承载的传统生活形态,已经基本消亡殆尽,背后的原因或许令人深思。

短短的14天,我在台湾感受到的是一个现代化与乡土气息混杂的社会,在某些方面,他的确承接着中华文化的某些形态,并且还对其有所光大,但我也看到,因为政治权力的收敛与受限,使得台湾的社会空间尚能充足地发育,使得某种“在地化”的本土意识已然形成,这种意识在某些政治场合下,或许会激化为某种现代的本土保守意识,但也因这种强烈的乡土气息,而不免淡化了那种强烈而持续亢奋的国族性格。

当一拨拨的大陆客带着自己的某种想象来到台湾时,他们或以此地见闻来浇一己心中块垒,或是心存霸道地视其为大中华背景下的小小注脚,在这些焦虑情绪下的所见所思,难免会罔顾此地的自我认知。无论褒奖或苛责,都或许需要暂时搁置那长久以来沉淀在大陆客心中的某种情绪,去平等地了解这块熟悉且陌生的土地,或许只有这样,太平洋的风才能真正吹进我们的内心深处。Q

拨乱反正从教育平权开始



特约撰稿人 吴强 (北京, qiangwu.de@gmail.com)

一段时间以来,由异地高考权利引发的抗争渐有蔓延运动之势。从北京近几个月发生的主张异地高考权利的群体与当地反平权运动的市民发生冲突,到上海的占海特事件,几件烈度不高的小规模抗议却在新媒体和公众舆论引发了轩然大波,似乎为中国新时期的社运指明了一条可行方向,值得各界保持密切关注。

对异地高考权利的争论甚至诉讼,已经颇有时日,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刚兴起的互联网BBS论坛上对高考移民、高考招分不平等的讨论,其中已经涉及异地高考问题。2001年青岛三考生直接向最高院起诉教育部、要求平等教育权,则打响了教育平权运动的第一枪。但是,要求实现宪法保障的平等教育权利的抗争,在21世纪初中国维权运动中并不算引人注目,直到最近两年,当维权运动总体陷入困境之后,教育平权运动才异军突起。这个运动由貌似单个的行动

和讨论所组成,却已经广泛涉卷入了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讨论、知识分子和受害者的参与,行动样式包括请愿和诉讼,甚至引发了反运动,合力构成一个日益壮大的教育平权运动。

例如,过去几年自发成立的多家农民工子弟学校,更有例如北京金盏乡农民工子弟学校为争取承认、保护校舍的维权抗争;2007年9月在京诞生的立人图书馆,致力于向乡村地区投送图书资源,并开展“立人大学”的培训;2011年3月起邓飞发起针对偏远农村学校的“免费午餐计划”;北京大学法学院2011年召开教育平权的宪法权利讨论会,并在2012年6月组织多位著名学者发出“关于教育部制定随迁子女学籍地高考政策的公民建议”;著名人权团体阳光宪政和许志永更长期支持在京常驻外地移民向教育当局提出明确的异地高考权利主张,其支持者在2012年10月26日与反对

高考平权的本地居民在北京教委信访处发生肢体冲突；最新的发展则是居住在上海而非沪籍的一位15岁女孩占海特力争平等中考权，其父于2012年12月8日在上海人民广场抗议时被拘留，引发上海和全国范围对“异地高考权”的讨论。

所谓异地高考权，准确地说，应是常驻地高考权，居于教育平权的核心，因为高考对户籍的严格限制以及不同省份高考录取难度的差异根深蒂固却无法变通，由此形成的僵化社会边界和政治停滞感正在引发各界的深恶痛绝，越来越难以被事实上的人口流动所容忍，一种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愤恨伴随着教育平权运动的兴起，正在蔓延、发酵。

理论上，教育平权涉及极广，关系教育资源分配的方方面面，教育资源分配又关系社会分层和流动、阶级差异和冲突、贫富分化和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城市化进程等。现有几乎每一个具体的教育平权主张，如常住地高考权利、农村集中办学问题、午餐补贴和住宿问题等，具有显而易见的迫切性需要改善。而其他更多通常已被视作当然的教育问题，如幼儿园的数量、分布、收费与排队、重点中小学校的择校费、残疾人的特殊教育、成年教育学历能否进入研究所等，也无一不关乎公民教育权利所系的社会正义。尤其是教育产业化背景下产生的985和211等高等教育分级制度，则在教育市场之外生生扩大了公民——大学生和毕业生的不平等，通过人为制造大学等级而制造社会差异和就业歧视。

而事实上，类似伴随毕业生终身的教育分级制度，充斥人口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阶级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尤其在社会分层日益固化、基尼系数扩大到危险的0.61（国家统计局对2012年的公布数据是0.474——编者按）的阶级分化背景下，现在的中国教育体制因此可说是一种严重的教育不公。

在倡导策略上，可以从常住地高考权利延伸到农民工子弟城市上学到边远农村山区孩子的教育权利保障、特殊人群的特殊教育、幼儿园入园平等、中小学入学平等教育平权运动主张，可以主张现有的精英教育不应以牺牲多数人的教育权利、造成教育资源分配的极大不公为代价。教育平权运动还应包括主张、保障少数民族应当获得的平等教育资源和权利，获得用少数民族语言接受教育、获得足够少数民族语言进行阅读的权利，和选择就业的轨道。教育平权运动各项倡导的宗旨，在于是尊重和保障每一个未来公民和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为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民教育而实现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保障每个学生都有可能在无歧视的环境下成长、就业，扭转当前边远地区、农村、农民工子弟、普通中小学和大学等面临的严重资源不足。

在行动策略上，应瞄准那些潜在的核心动员对象，即为数众多的非985非211的学生，应当提出：废除制造教育不公、给予教育部极大设租空间的985、211体系，还所有大学生一个平等的教育资源分配。因为，被精英教育体制排除在

外的普通大学和学生们的，不仅正在被迫面对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还将忍受因此产生的终身歧视。这一歧视，不仅包括就业歧视、升职歧视、考研歧视，甚至贯穿着婚姻和人生，不断在人口生产中复制着985歧视。因为他们是现行不公平教育体制从城乡差别、从幼儿园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最大受害群体，以似乎985和211体系之外的贱民一般活着，也是即将到来的每年700万毕业即失业大军的主体，或者被迫成为北上广地区的“蚁族”，沉入大都会最底层。

所以，动员他们投身教育平权运动，作为教育平权运动的最大后备军，便是教育平权运动的中心任务。教育平权运动的动员必须让他们以及所有人意识到985和211才是中国教育乃至人类的耻辱，并且将幼儿园择园费、中小学择校费、学生午餐、学生医疗、特殊教育等教育相关的社会议题转化为教育平权运动的后续动力。🔴



“不与国家权力斗争的导演 没有拍电影的资格”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2012年10月12日，著名电影导演若松孝二(Kouji Wakamatsu)在东京遭遇车祸，头、腰部受重创，昏迷5天后去世，享年76岁。至此，这位浑身充满反骨的、日本影坛著名的“无赖派”导演完成了最后的谢幕。23日，东京都青山葬仪场，在淅沥的冷雨中，有超过800人为他守灵、送行。

若松属于那种创作机器型导演：自1963年登场以来，作为导演和制片人，亲自执导、制作过百余部影片和10部电视剧；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日本导演，其作品曾斩获世界最权威的柏林、戛

纳、威尼斯三大电影节大奖；2012年拍摄完成的《千年的愉乐》，原本预定于来年春举行首映式，导演的缺席终成莫大遗憾。

在精英辈出的日本电影界，若松是草根中的草根。1936年，出生于宫城县远田郡涌谷町。读农业职高二年级时中退，后进（东）京谋生。学做手艺人、送报纸，甚至为“雅酷杂”（即黑社会）打下手，遍历底层之种种。1957年，因卷入一场街头流氓械斗，遭警察拘捕。后虽被判缓刑，但却种下了与权力对峙的根子。其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甜蜜的圈套》，虽

然是一部情色片，其中便预设了警察被殴的暴力情节。作为导演，他从不回避对现实的人生遭遇实施“艺术的报复”。

像很多战后出道的日本电影人一样，若松也是从拍摄成人影片走上创作之路。但同样是情色电影，若松的作品中有种明显的政治意味，令观众本能地意识到性政治，对暴力的表现也远多于同时代导演。如《墙中秘事》（壁の中の秘め事）中，描写一对夫妇的寝室被隔墙之眼窥视，嘿咻嘿咻姿态万千，娱己愉人。这原本是黄色电影中用滥了的老套情节，但在“若松流”的处理下，卧室内壁上，贴着一幅巨大的斯大林肖像摄影。

彼时的先锋文化领袖寺山修司，曾评价若松早期的作品“像这样一根筋地表现令人反感的题材，倒也很有趣”，甚至表示想做他的助理导演。寺山当时正如日中天，此话着实让若松吃惊不小。待寺山走后，他小心翼翼地问别人何谓“令人反感”。被告知“就是像你这样的家伙。艺术中有超现实主义，指为了颠覆日常，以非日常的东西碰撞，从而给人造成冲击”。若松听罢，松了一口气：“哦，如此说来，那确实是俺。”20世纪60到70年代，若松量产一批情色电影，有“桃色巨匠”、“桃色黑泽（明）”之称。后由大岛渚执导的著名问题电影《感官世界》（愛のコリーダ），即是与若松合作的结晶（若松担任制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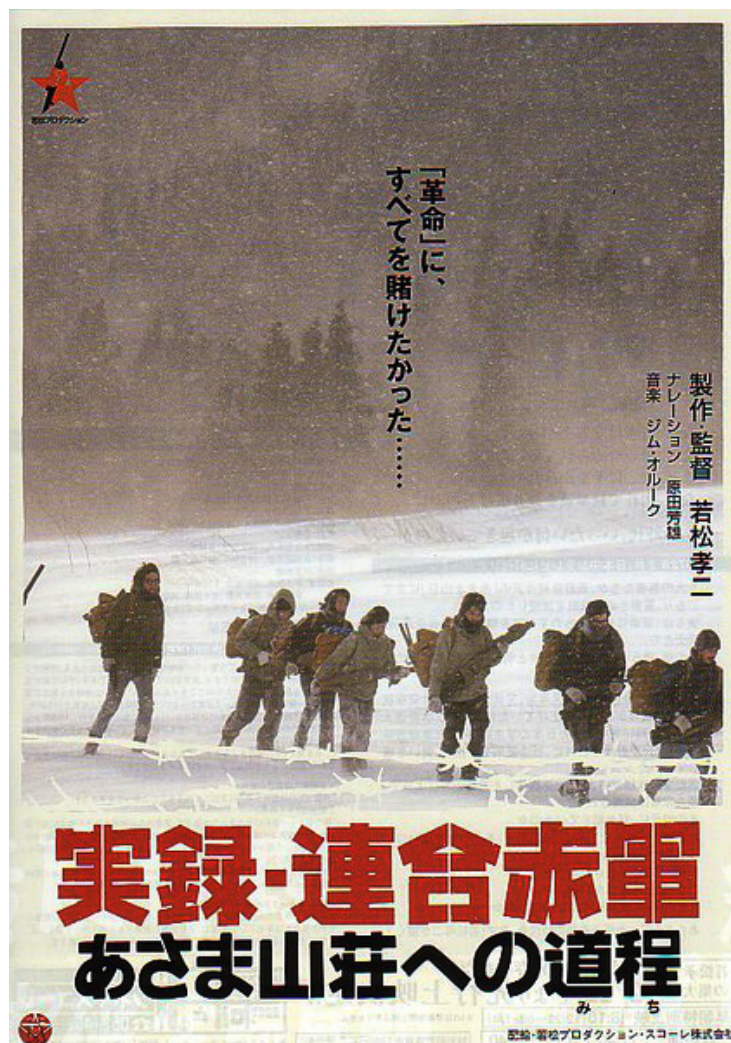
在情色电影赚得盆满钵满之后，若松的视野开始转向时代的大主题——社会运动。最初是巴勒斯坦，若松打算赶赴巴黎出席戛纳电影节时绕道巴勒斯坦。彼时，日本赤军也视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同时革命”的一环。但计划却遭到搭档大岛渚的反对，因为当时大岛正与法国电影制作公司合作拍摄。而西方电影业泰半控制在犹太人投资者手中，大岛唯恐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会得罪以色列，从而开罪犹太人。这种弯弯绕的道理，不说则已，一说反而激发了若松的反骨：“大岛君，若是这么说的

话，俺去定了！”

于是，与著名赤军艺术家、后在黎巴嫩被捕，在海外被囚禁26年的足立正生合作，拍摄了《赤军——PELP·世界战争宣言》（PELP全称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某日，在跟拍巴勒斯坦游击队时，突然被要求“今天拍完全部内容后下山”。若松觉得有些不对劲，但因涉及军事秘密，不便多问，便加快了拍摄速度。拍完预订内容后，即率摄制组回到贝鲁特。两天后，翻开报纸一看，那些每天一块吃饭、一起挖战壕的游击队战士，被处绞刑的照片充斥了版面——基地被全歼。若松和足立发誓，不能流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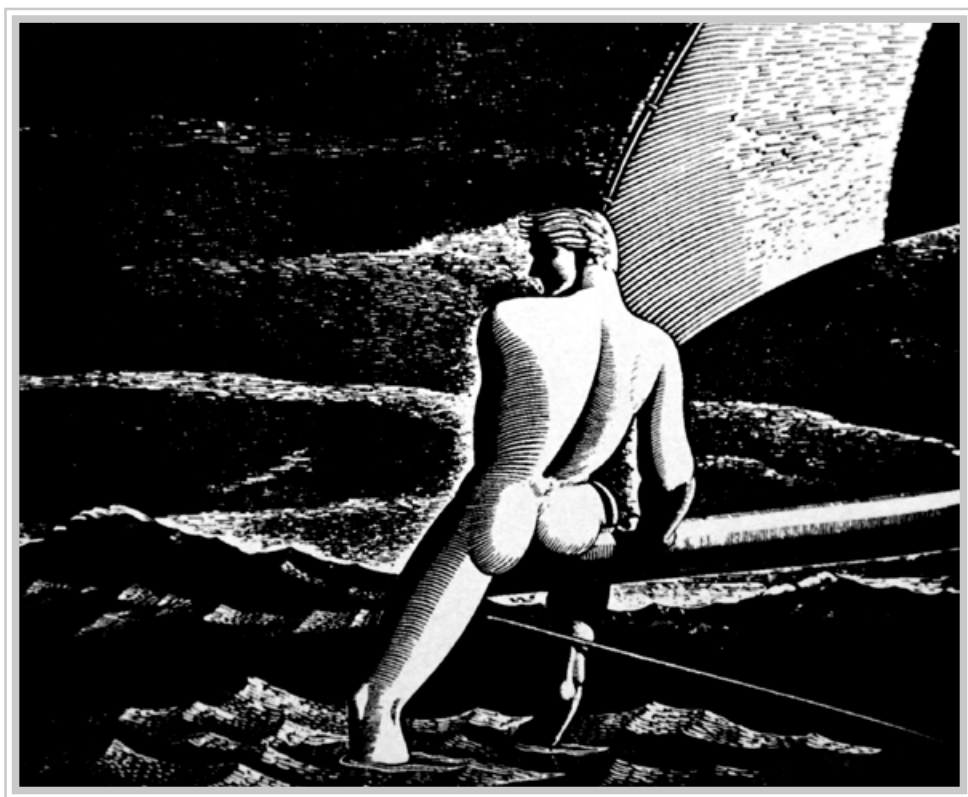
若松的严肃作品，有很强的纪实性，深刻记录了日本在高度增长期所遭遇的挫折，有来自右翼的，也有左翼的。导演的着眼点，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毋宁说是人本身，一代青年的青春与生命。《11·25自决之日——三岛由纪夫与年轻人》再现了作家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戕事件与右翼团体“楯之会”成立的历史；《实录·联合赤军——通向浅间山庄之路》则揭示了极端左翼运动最残酷的一面：那些不惜诉诸血腥自肃的精英大学生，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这也是若松终生追问不已的问题。他生前有句口头禅，“死前要践行对青年的责任”。即使在言论自由的民主主义国家日本，若松的题材似乎也过于“敏感”。这使他成为国家公安当局重点监



控的对象，住宅遭搜查。但面对战后历史及在历史大潮中沉浮的生命，若松未曾背过脸去，他甚至说过不无过激的话：

“不与国家权力斗争的导演没有拍电影的资格”。**Q**



顺风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
景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